

中图分类号： I206.2

密级： 公开

UDC： 800

学校代码： 10094

河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学历硕士)

《搜神记》狐故事研究

The Research of the fox story of the *Soushenji*

研究生姓名： 杨倩

指导教师： 张蕾 教授

学科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

研究方向： 魏晋南北朝文学

论文开题日期： 2017年7月3日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日

中图分类号： G243

密级： 公开

UDC： 800

学校代码： 10094

河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学历硕士）

《搜神记》狐故事研究

The Research of the fox story of the *Soushenji*

作 者 姓 名 ： 杨倩

指 导 教 师 ： 张蕾 教授

学 科 专 业 ： 中国古代文学

研 究 方 向 ： 魏晋南北朝文学

论文开题日期： 2017 年 7 月 3 日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搜神记>狐故事研究》，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杨倩
2018 年 5 月 28 日

指导教师确认（签名）：陈蕾
2018 年 5 月 28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河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河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_____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论文作者（签名）：杨倩
2018 年 5 月 28 日

指导教师（签名）：陈蕾
2018 年 5 月 28 日

摘 要

狐故事在古籍中早有记载，干宝《搜神记》则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故事类型——学问狐故事。本文以《搜神记》狐故事为研究对象，分析狐故事明显呈现出的时代风气和隐约反映的社会实际，并对比其他狐故事，挖掘狐故事的独特之处。

全文分为三章。第一部分分析作者史官身份给狐故事书写带来的影响。狐故事以史书笔法书写，文史互渗，真实的人物和地域，使读者更为信服。长期简练的写史习惯导致狐故事内容简短，缺乏想象，篇幅受限。狐故事不像作者特意编撰的志怪小说，更像是对事实的一种真实记录。尽管如此，《搜神记》中的狐故事相对于以往的狐故事来说，已经有重大突破。作者借助各种表现手法，如语言、行为描写，使得狐形象更加立体化。《搜神记》中 12 篇风格各异的狐故事呈现出四种模式化的故事类型，以及狐化人情节的屡屡出现，为后世狐故事所效法。

第二部分把学问狐故事与《搜神记》中的其他狐故事进行对比，见出学问狐故事的独特性。首先是学问狐在故事中呈现妖性减弱，人性突出的趋势。学问狐不仅能变化人形，更为重要的是注重内在的修养，博学多才、善于清谈，交流学识，乐于传道，所有的这些行为正是精怪人性得以突出的表现。其次作者在学问狐故事中有意识改善人狐之间的对立关系。虽然狐最后的结局或死或逃，但狐祸害人间的固有观念得以改变。再次学问狐故事展现了时代风貌。学问狐好学、多才、自信、从容，吸收天地精气，学习人类智慧，获得千年寿命，显示出较之其他狐类的独特性。

第三部分探究狐故事的文化意蕴。魏晋文人追求学问，痴迷谈玄论道的风气，也在异界故事中得以呈现。学问狐学问渊博，热衷结交社会名流，乐于传道授业，可谓知识界的精英。清谈风气影响下的学问狐故事，独具时代气息。学问狐故事凝聚着作者干宝对清谈误国的反思，有重振儒家文化的用意。但无论精怪多么优秀，身份曝光就面临灭顶之灾，此为主流除怪文化的折射。狐故事还具有地域特色，《搜神记》不少故事发生在吴地，与作者从父祖辈始居吴地、仕宦生涯多在吴地、结交友人多为吴人有密切关联。

关键词： 《搜神记》 狐 干宝

Abstract

The story of fox is well documented in ancient books, and Gan Bao's *Soushenji* created a unique type of story - the story of learning fox.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ox story in the *Soushenj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ethos of the fox story clearly and reflects the social reality implicitly, and compares the other fox stories to dig the uniqueness of fox stories.

The full text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part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author's historical official identity on fox story writing. The fox story is written i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method. The infilt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d the real characters and regions make readers more convinced. The long and concise habit of writing history leads to fox stories with short content, lack of imagination, and limited space. The fox story is not like the bizarre novel written by the author. It is more like a true record of facts. In spite of this, the fox story in the *Soushenji* has made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comparison to the fox stories of the past. The author uses a variety of expression techniques, such as language and behavior description, to make the fox image more three-dimensional. The 12 fox stories with different styles in the *Soushenji* show four types of model stories,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fox-fire plots are repeated for the fox stories of the later world.

The second part compares the learning Fox story with the other fox stories in the *Soushenji* and sees the uniqueness of the learning Fox story. The first is the learning of Fox in the story to show demon weakened the trend of outstanding humanity. Learning fox not only can change the human form, more importantly,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ner cultivation, learning from many talents, being good at talking, sharing knowledge, and being willing to preach. All of these behaviors a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strangeness of human nature. Secondly, the author intends to improve the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foxes in the learning fox story. Although Fox's final outcome may have died or escaped, the intrinsic concept of fox damage has changed. Learning the fox again tells the time. Learn to learn, versatile,

self-confident, and calm. It absorbs the essence of heaven and earth, learns human wisdom, and attains the millennia of life, showing its uniqueness over other foxes.

The third part explore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Fox story. Wei and Jin pursuit of knowledge, obsessed talk on the mysterious road of culture, but also the story of the outsider to be presented. He has a profound knowledge of learning and is keen to make social celebrities. He is willing to teach in the industry and is elite in the intellectual world. Talk about the academic fox st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tmosphere, unique atmosphere. The Fox Story tells the author's reflection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However, no matter how excellent the genius is, the identity exposure is faced with catastrophe. This is the mainstream of the refraction of strange culture. The fox story also ha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Many stories in the book *Soushenji* occurred in the Wu area. The story begins with the author's father ancestors living in Wu area, his official career in Wu area, and his friends making friends with Wu.

Key words: *Soushenji* Fox Gan Bao

目 录

摘 要.....	III
Abstract.....	V
引 言.....	1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1
二、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1
第一章 干宝与狐故事的书写.....	5
第一节 文史互渗的撰写方式.....	5
第二节 狐故事的书写特点.....	8
一、描写的立体化.....	10
二、情节的模式化.....	14
第二章 狐故事的独特性.....	17
第一节 凸显人性.....	17
第二节 重构人狐关系.....	19
第三节 展现时代风貌.....	21
第三章 狐故事的意蕴.....	23
第一节 重现好学盛况.....	24
第二节 反映清谈风气.....	28
第三节 认同除怪文化.....	34
第四节 寄托吴地情结.....	37
结 语	47
参考文献.....	48
致 谢	51

引言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狐故事古籍中早有记载,如《战国策》中狐假虎威故事表达的寓意、《史记·陈涉世家》中起义军借助狐鸣传达民意、《西京杂记·栾书冢》里广川王伤狐脚遭到报应等。随着时间的流逝,狐形象发生了剧变: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跌落人间,成为危害人类的一种妖怪。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兴盛,狐的身影穿梭于《列异传·狸髡》、《搜神后记·古冢老狐》、《洛阳伽蓝记·孙岩》、《异苑·胡道洽》等故事中。《搜神记》作为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撰有十几篇狐故事,其中独具特色的就是学问狐故事。本文聚集于此,力争挖掘《搜神记》狐故事所包含的意蕴,与其他狐故事进行对比,展示《搜神记》狐故事的独特魅力。

魏晋时代独有的清谈风气是各个领域都无法绕开的研究内容,因此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即清谈之风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对狐形象塑造的影响。对学问狐身份的肯定是本文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对狐身份的认定与作者本人身份有关,本文以作者身份为研究视角,探讨干宝的史官身份为狐故事撰写带来的特点。狐故事也涉及了主流除怪文化和干宝的地域情结。干宝选择董仲舒和张华这样的文坛大家作为狐故事主角之一的目的和意图也值得我们探究。

综上,对于狐故事的研究,以作者身份为研究视角,狐故事为研究基础,时代风气为突破口,还要结合干宝借助狐故事想要表达的思想与意愿,更好的剖析狐故事背后的意蕴。

二、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关于狐故事,学界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学界把狐故事进行了分类,如胡堃的《论中国古代狐仙故事的历史发展》把魏晋南北朝中的狐仙故事根据故事中狐形象特点,分为了四种故事类型,即学问型、交友型、凶宅型与狐仙型,颇有新意^①。龚佑臣《论<搜神记>中狐的形象类型及其文化隐喻》文中将《搜神记》中狐形象分为四类:未卜先知的狐、学识渊博的狐、凶狠残暴的狐、媚惑淫邪的狐等等,指出这是对当时社会百态的某种反映和影射,隐晦地反映了作者干宝对魏晋时期政治现状、社会百态的思考与认识:

^① 胡堃:《论中国古代狐仙故事的历史发展》,《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3期。

对超自然力的理想追求；对门阀制度的批判反抗；对世风日下的无情鞭挞等等^①。王妮妮《从<太平广记·狐>看狐意象的演变类型》文章虽然是以《太平广记》为研究对象，但涉及到《搜神记》中狐狸形象的演变，狐作祟或狐化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有着雌狐和雄狐之别。雄狐意象的演变大致有邪恶之兽与博学书生两种类型。狐以书生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内，为狐形象塑造增加了新意，也成为后世小说中常见的一种文学形象^②。宋成斌《中国古代文学狐精意象解读》提及“雄狐”又形成了“狐博士”的类型，狐妖表现为学狐、才狐、儒狐在后世文学中反复出现^③。

但《搜神记》中的学问狐没有沾染狐的一些恶习，是正面、无害的知识分子形象，受清谈之风的影响，有魏晋名士的影子。如丁秀霞《简析<搜神记>中吉狐和学问狐形象》一文指出魏晋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故事类型—学问狐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学问狐”不仅有魏晋士大夫崇尚清谈的潇洒风度，而且还有魏晋名士注重神明、气质的外貌描写。学问狐这一形象的产生既反映了时代潮流，也是崇狐文化的一种积淀，同时也是作者才华和价值观、世界观的体现。《搜神记》中的狐精故事远比其他精怪故事丰富生动，为狐故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也为后世作家创作狐故事提供了借鉴^④。陈曦《浅析古典文学及现代影视作品中的“狐”形象》认为从《搜神记》来看，狐妖已经分为了才狐、淫狐和与人为害的鬼狐。《胡博士》中的胡博士，可以说是才狐的原型开始。《斑狐和华表木》中的斑狐学识渊博，谈吐不俗，行为放荡不羁，颇有魏晋名士的风范^⑤。徐丽丽《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中提及自古以来的狐故事作品中的男狐始终显示出独特的“才情”，一般多被塑造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君子。有关狐饱读诗书的最早记载见于《搜神记》中的《胡博士》，并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⑥。

学界对人狐关系也给予了关注，学者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如王振星《中国狐文化简论》一文认为狐精形象在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中具有了独特特

① 龚佑臣：《论<搜神记>中狐的形象类型及其文化隐喻》，《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② 王妮妮：《从<太平广记·狐>看狐意象的演变类型》，《延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③ 宋成斌：《中国古代文学狐精意象解读》，《理论观察》，2007年第4期。

④ 丁秀霞：《简析<搜神记>中吉狐和学问狐形象》，《蒲松龄研究》，2012年第4期。

⑤ 陈曦：《浅析古典文学及现代影视作品中的“狐”形象》，《人文天下》，2015年第2期。

⑥ 徐丽丽：《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吉林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

性:它混迹人间,既与人友好相处又作祟害人。以《搜神记》为例,斑狐拜访张华,老狐精集群狐于家中讲书。这反映了魏晋儒士清谈的时尚,有一定的现实感^①。李永祥《说狐》则认为狐与人的关系是敌对的,狐的出现带给人的是祸殃或惊怖,而人则想方设法地加以驱除或殄灭^②。蒋宸《唐前狐怪传说源流考略》提及魏晋六朝志怪故事中的狐妖被作家们赋予了人类的外貌和行为,可是狐妖多么的像人类,人们始终无法改变对异类的态度,一旦狐妖的身份被识破,难逃被驱逐和扑杀的厄运。所以《搜神记》中的斑狐尽管其无害于人且学问渊博却仍要遭到扑杀。其背后隐含的是中国人天生的“排异”思维特点和“实利主义”的价值标准^③。吴康《精灵的世俗化——论两汉魏晋的志怪书写》该论文把《搜神记》中狐狸幻化成人并与人类进行智慧较量的故事称为“狐辩”,认为是一种母题类型。这类故事中狐狸的结局是悲惨的,但作者认为它们的形象仍然是光彩照人的,是智慧的化身,是追求知识、反抗专制权力的象征。狐精形象的悲剧冲突是我们超出自然尺度的智慧和力量的追求与自然本身的现实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冲突^④。

狐故事多涉及狐化人的情节,学界或认为狐狸幻化成人形是一种妖性行为,或认为是对现实的曲折影射,或认为是“物老成精”观念的印证等,这些观点多以学问狐为例。如陈佳冀的《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历史传承与类型衍生》从动物化形故事类型的角度看《搜神记》的意义,《搜神记》中的狐狸形象隐去了动物的原貌,具备了人的外貌与具体的行为特点,实现了完全意义的“动物化形”。该类动物形象都被赋予妖化与邪恶化的谕旨,类似的狐化作品都表现了这种动物化形意象的“妖化”负面效应^⑤。王青《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把狐狸形象分为六种,第一类就是博学多才之书生,举例则是《搜神记》中的《花斑狐狸》和《胡博士》。该文作者认为狐妖形象的出现并不与狐狸的自然属性和狐文化有关,而是与胡人之生理特征、文化习俗与技能特长有关。狐怪故事中多博学者、术士与僧人是现实生活中胡人形象的折射^⑥。韦凤娟的《另类的“修炼”——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一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狐妖不仅能幻

① 王振星:《中国狐文化简论》,《齐鲁书刊》,1996年第1期。

② 李永祥:《说狐》,《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③ 蒋宸:《唐前狐怪传说源流考略》,《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④ 吴康:《精灵的世俗化——论两汉魏晋的志怪书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⑤ 陈佳冀:《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历史传承与类型衍生》,《厦门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⑥ 王青:《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化为人形到人间作祟，还期望获得人类的身份、地位、职业等外在条件，满足人类在社会上生存。狐妖积极地融入社会，混迹于人间生活，这种人化的程度之高是其他精怪所不及的^①。张玉莲《〈搜神记·斑狐书生〉的文学与文化解读》单独列举了清谈一流的狐妖——斑狐书生。斑狐书生在人们的印象中既有狐狸的机智，又有魏晋时代清谈之风的遗韵。人狐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冲突，最终以人类杀死花斑狐狸为结局结束了这一故事。该故事是魏晋时期人的地位上升、人敢于肯定自身价值、人的觉醒的一种文化表现。精怪文化的背后也隐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有善于变化，不畏犬的神性和动物属性，又是一位博识敏辨的名士形象，是魏晋清谈之风浸染的结果^②。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研究成果发现，国内学界对《搜神记》狐故事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采用分类研究、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等方法，为笔者进行本论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对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文本进行初步整理与归纳后，笔者发现文本共有12则狐故事，在整部小说中所占比重不大，却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将《搜神记》狐故事分为三类：征兆狐、作祟狐、学问狐，并分析《搜神记》狐故事书写的特点和固有的叙事模式，从书写方式、叙事特征、故事类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力图挖掘《搜神记》狐故事与之前狐故事的“异”，体现《搜神记》狐故事对传统文化创新以及对后世文学影响的双重文化特点。结合魏晋时代特征，分析狐故事背后隐含的文化意蕴，如好学盛况、清谈之风，除怪文化以及作者的地域情结。

① 韦凤娟：《另类的“修炼”——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② 张玉莲：《〈搜神记·斑狐书生〉的文学与文化解读》，《殷都学刊》，2011年第49期。

第一章 干宝与狐故事的书写

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新的题材和主题不断加入其中，狐故事就是其中的一支，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伴随的人类审美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经过历代作家的共同努力，狐故事无论在思想内容亦是艺术水平上，都日趋新颖，逐步完善。狐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经历了由动物性为主，到兼具动物性、神性、妖性、人性的发展历程，创作了数之不尽的文化经典。下面我们以干宝《搜神记》中的狐故事为例，探究狐在干宝笔下的风姿。

第一节 文史互渗的撰写方式

干宝受史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影响，撰写《搜神记》一书呈现出文史互渗的特点，即正史史料与杂闻小说掺杂在一起。具体特征如下，一是小说全盘接受史书内容，史书也把小说内容等同于史实。《搜神记》中一些故事就直接取材自《史记》、《汉书》和《三国志》等史书，如《陈宝》《于吉》《邢史子臣》《张掖开石》《诸葛恪》等故事；而后世史书的编撰者又常常把《搜神记》故事如实载入史册，《后汉书》《晋书》《宋书》把《搜神记》中的故事作为真实史料，在前面加上“干宝曰”、“干宝以为”之说，如《大石自立》《灾祸星》《青龙黄龙》《鱼集武库屋上》等故事。二是小说与史书间的相互模仿。小说向史书书写方式靠拢，小说中涉及历史人物的姓、字、籍贯、事件等内容尽量依史而撰，如《狸神》《狸客》《斑狐书生》等。而史料在记述真实事件时又夹杂了想象虚构，凸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传奇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相信志怪小说中描写的内容是真实的，怪诞不经的狐妖故事也被当作事实流传下来。另一方面受到经史观念影响，未被正史录取的杂史杂记被学者编撰为小说，以补正史之缺。三是小说书写者干宝长期担任史官一职，《晋书·干宝传》载干宝作为史官成绩斐然，获“良史”之誉：“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①干宝领修国史约十年，习惯了简洁概括的书写方式，以干宝在编写《搜神记》时也遵循“信”和“实”的写作原则，《搜神记·序》中干宝把自己的小说创作与史书撰写原则联系起来：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

^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49—2150页。

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晋书》）^①

干宝遵照写史的原则撰写小说，确信自己书写的内容，即使是小说也尽量真实，因此干宝的小说有“事实”记录的特点。“事实”是真实的、可信的，这就束缚了作者的想象力，造成《搜神记》故事情节简单，缺少详细描写，人物呈现单一和模式化缺陷，也限制了小说书写的篇幅。干宝虽然面临着如此困境，其书写短小精湛故事的同时又极力避免叙事的平铺直叙。干宝所写的学问狐故事，情节曲折丰富，人物关系复杂，故事主旨更加深刻，开创了一种新的狐故事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的产生是因为干宝对狐的态度与前人大不相同，首先是干宝本身就相信奇异之事，他以肯定狐妖的存在为前提来讲狐故事。《晋书·干宝传》载：

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②

《搜神后记》卷四《干宝父妾》也有同样的记载：

父莹，有嬖妾。母至妒，宝父葬时，因生推婢著藏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经十年而母丧，开墓，见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视犹暖，渐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云宝父常致饮食，与之寝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③

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干宝父亲喜好阴阳之术，相信对他有一定的

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150 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150 页。

③ 陶潜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后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557 页。

影响，之后干宝经历了父亲宠妾和兄长死而复生之事，发生在身边的神异之事不得不使干宝相信鬼神确实存在，正如鲁迅所言“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①，也就是说神鬼怪异之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真实存在的，狐妖故事也不例外。狐故事出现在《搜神记》一书中的意义就是为了验证狐妖存在的真实性，例如《马化狐》中狐狸的异化与历史上著名昏君周幽王的出生联系起来，以此证明狐妖不仅存在而且奇异。而《淳于智卜狐》记录了淳于智助人解除祸患之事，狐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解除祸患的线索。夏侯藻遵照淳于智所说“在嗥处拊心啼哭”^②，救了全家人的性命，叙事的主旨在于突出淳于智占卜之术的精准，同时指出狐妖出现的预兆意义。而在《狸神》、《斑狐书生》中详细记述了狐在人间之事，多种多样的叙述手法，合情合理的故事情节，焕然一新的人物设定提高了狐故事的可信度。

其次《搜神记》中十二篇狐故事呈现出复杂态度，有敬畏之情，如《马化狐》、《淳于智卜狐》故事；有好奇之态，如《阿紫》、《狸神》；有批判之情，如《庐陵亭》、《宋大贤》、《吴兴老狸》；有些态度不甚明确，如《句容狸妇》、《倪彦思家魅》等。纵观十二篇狐故事，大致可以分为狐助人、狐害人与狐媚人和学问狐四种类型，如《狸神》中对刘伯祖的仕宦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狸神；《庐陵亭》汤应与滥杀无辜的狐进行恶斗；《阿紫》条记述了被迷惑男子回忆阿紫如何魅惑与他。人们普遍相信狐出现在人间代表着祸乱，但《搜神记》中有些例外，学问狐进入人间的目的较为特殊，如《狸客》、《斑狐书生》中狐进入人间是为了交流学问，追求声誉；《胡博士》则是为了获取知识，教书育人，教导晚辈。干宝对学问狐所持的情感态度与文本中其他狐故事完全不同，独具魅力的学问狐形象，寄托了作者过多的情感，它们完全被理想化、艺术化。它们有高尚的德行，过人的知识，出众的容貌，进入人间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赏识，不再害人作恶，作者在撰写这些故事时主动改变人狐敌对关系，试图扭转人对狐的旧有观念。

受史书书写习惯的影响，《搜神记》狐故事叙述在时间上、空间上比较集中。不仅故事从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十分短暂，经常发生于某个晚上或某个白天，人与狐无论是惊心动魄的打斗，还是悠然自得的交谈，都在短短的时间内结束。而且人物活动的空间也狭窄，多发生在一个亭子里、某人家中、空冢前，故事发生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9 页。

②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69 页。

地点比较集中和固定。但是，这时的狐故事已具小说结构，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像《狸神》、《阿紫》、《斑狐书生》这几篇故事，篇幅较长，内容较充实，有了简单的外貌描写和人物对话，情节丰富、跌宕起伏，不失为狐故事创作的新尝试。以狐为题材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新方式，为后世狐故事的兴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节 狐故事的书写特点

从《山海经》到六朝志怪，狐形象塑造由简单向丰富转变。狐形象几经变化，呈现了自然狐、神狐、妖狐的演变过程，在众多的精怪故事中独具特色。不仅狐形象愈发独特，狐故事的书写方式也更加多样，以《搜神记》狐故事为例，狐故事的书写呈现出形象立体化和情节模式化特点。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狐形象的历史变化情况。狐狸生活在人类可以观察到的范围内，是一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它体型适中，相对于猛虎野兽而言，危险性低，容易捕食，皮毛还可以取暖，如《豳风·七月》“取彼狐狸，为公子裘”。（《毛诗正义》）^①事实上狐狸最引人遐想的是那条蓬松柔软的大尾巴，继而产生了九尾狐传说，如记载奇珍异兽的《山海经》一书多次涉及九尾狐传说：

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之不蛊。（《南山经》）^②

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海外东经第九》）^③

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大荒东经》）^④

居住青丘之地的狐狸，多为九尾、四足，能食人，不能语，充满野性的自然狐。秦汉之际，狐出现在神话故事——大禹治水，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详细记载了这个故事：

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征也。

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龙龙。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⑤

九尾狐因为与大禹这样带有传奇性的帝王联系在一起，地位得以提高，成了高贵

① 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

②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7页。

③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304页。

④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400页。

⑤ 赵晔撰、吴琯校：《吴越春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2——183页。

的神兽。受汉代谶纬学说影响，狐化身为代表道德、兴盛、和平、祥瑞的神兽。如：

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则见。东夷归之，一本曰：王者不倾于色则至。（《艺文类聚》卷九十九《祥瑞部下·狐》）^①

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封，免西伯之难。（《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七《瑞应编·周文王》）^②

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则见，出则衔书。作瑞周文，以标灵符。（《足本山海经图赞》）^③

天子猎于滹泽，得白狐。（《穆天子传》）^④

狐带来祥瑞之兆的记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狐与人间帝王相联系，狐为君主的统治带来祥兆，给人类带来好运，于是狐狸被赋予了预测吉凶的本领。首先是吉兆，如《周易》“解”卦“九二”卦记“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⑤，意思是去打猎，从捕获的狐狸身上得到许多黄铜箭头，这是合于正道而吉利的征兆。《周易》“未济”卦又云“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⑥意思是事业即将成功却遭遇挫折，如同小狐狸快要成功渡河时却沾湿了尾巴一样，对事业没有好处。但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成功之前必须要经历挫折，只要不放弃就会成功。与此同时，狐代表的凶兆也被夸大了，如《左传·禧公十五年》载：

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⑦

狐与“蛊”与君联系在了一起。而所谓“蛊”在《左传·昭公元年》中有解释：

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祸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⑧

“蛊”在这里指淫溺惑乱于女色。人们认为祸国殃民的绝色美女一般由狐妖幻化而成，狐自然成了惑乱之源，狐负面形象的出现反而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此

①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年，第 1715 页。

②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3653 页。

③ 郭璞著、张宗祥校录：《足本山海经图赞》，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8 页。

④ 郭璞注：《穆天子传》，岳麓书社 1992 年版，第 202 页。

⑤ 姬昌著、宋祚胤注译：《周易》，岳麓书社 2000 年版，第 195 页。

⑥ 姬昌著、宋祚胤注译：《周易》，岳麓书社 2000 年版，第 310 页。

⑦ 洪亮吉撰：《左传》，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93 页。

⑧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223 页。

后大多数的狐以反面形象出现在志怪故事中。东汉许慎对“狐”的解释是“狐，妖兽也，鬼所乘之。”^①狐被当作一种妖怪而广为流传。郭璞《玄中记》曰“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鲁迅全集·古小说钩沉》）^②由此看来，狐能幻化人形的故事在当时不足为奇。魏晋六朝涉及狐的文献有《列异传·狸鬣》^③、《搜神后记·古冢老狐》^④、《洛阳伽蓝记·法云寺·孙岩》、《异苑·胡道洽》、《述异记·梁莹》^⑤等，足见撰写狐故事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风气。狐故事在魏晋时期大量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出于人类对异类的好奇与恐惧心理，普遍认为狐本质上是邪恶和魅惑的，因此魏晋志怪小说中的狐充满了妖性，神兽、祥兽身份逐渐淡化，最终沦落为一般的精怪。狐妖不具备高强的法术，犬类和华表木可使其显出真身，轻而易举地被杀害，因此狐和其他精怪一样受到人类排斥和扑杀。另一方面受传统礼教熏陶，人们对淫乱现象是敏感的。狐本身的妩媚之态以及上古赋予狐性爱文化之寓意使得狐在人们印象中化身为祸患人间的美女形象，狐狸精更是受到人们的憎恨和厌恶，干宝还将狐狸精的名字记录在《阿紫》故事中：“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⑥狐故事从此愈演愈热，狐形象千变万化，狐故事的描写也愈发成熟。

一、描写的立体化

《搜神记》狐故事描写呈立体化特点，即采用多种表现手法全方位的展现故事，使得作者塑造的狐形象更加细致，更为突出。《搜神记》狐故事外貌描写呈现出由无向有，由平面向立体演变的一种趋势。

在同类题材的作品，《搜神记》狐故事外貌描写明显增加，我们可以与其他狐故事进行对比，如《焦氏易林》中写到的狐：

①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78 页。

② 鲁迅著：《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492 页。

③ 《列异传》仅存一些佚文，有些内容为后人伪作。关于《列异传》的作者，据唐代魏征等人撰写的《隋书·经籍志》记载，是魏文帝曹丕所作；宋人的《旧唐书》、《新唐志》认为是张华所撰；清代姚振宗认为张华续写了《列异传》，后人合为一书。南朝刘宋裴松之《三国志》，魏郦道元《水经注》皆征引此书内容，书出魏晋人之手是可信的。

④ 《搜神后记》题为东晋陶潜（365-427）撰。所记有元嘉十四年（437 年）、十六年（439 年）事，皆陶潜死后事，故疑此书为伪托，或为后人增益。

⑤ 南朝齐祖冲之（429—500）撰。所记多是鬼异之事。《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共有 10 卷。现已失传。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易与任昉的同名小说《述异记》相混。

⑥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1 页。

三足狐鸣，灵鸣督邮，思过罚恶，自贼其家。（《小畜》之《未济》）^①

老狐屈尾，东西为鬼，病我长女，哭涕浊指。（《睽》之《升》）^②

老狐多态，行为蛊怪，为魅为妖，惊我王母。（《萃》之《既济》）^③

在《焦氏易林》中对狐的外貌描写仅有“三足”、“屈尾”、“多态”等寥寥数语，且多是对狐动物属性的描写。后经过作家不断地想象，狐的外貌描写在《搜神记》中出现了新特点，如《宋大贤》中狐妖的有了“瞋目蹉齿，形貌可恶”^④的外貌描写，写出了狐妖丑陋可怕的样子。《胡博士》中只有“皓首”^⑤两字，言简意赅，读者从文中仍可获悉“胡博士”是一位老者形象。《阿紫》条中雌狐“作好妇形”^⑥勾引人间男子，相貌究竟如何，引人遐想。《斑狐书生》故事因为篇幅较长，作者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⑦，张华初见斑狐书生，为其容貌和气质倾倒，是张华愿意和花斑狐狸交谈的前提，可见魏晋士人容貌和气质并重。对比魏晋之前狐外貌的描写，《搜神记》对狐外貌描写正变得丰富起来，《搜神记》中狐外貌描写不再局限于其动物性特征，转而关注狐幻人后的容貌描述，作者把人类的外貌特征赋予狐。在数量上，干宝《搜神记》所收12篇狐故事，对狐狸外貌进行描述的就有6篇，整篇故事中增加了外貌描写的比重，所有这些都为唐传奇狐形象注重外貌描写打下了基础。

语言可以反映人物性格，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所以故事中多采用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特点。魏晋之前的狐故事，狐的言语较少甚至没有语言描写，故事也较简洁。如：

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南山经》）^⑧

三足狐鸣，灵鸣督邮，思过罚恶，自贼其家。（《小畜》之《未济》）^⑨

这时狐只能“音如婴儿”、“狐鸣”。《搜神记》中的狐已经会说人语并能与人交谈，

① 焦延寿撰：《焦氏易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页。

② 焦延寿撰：《焦氏易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9页。

③ 焦延寿撰：《焦氏易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3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4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3页。

⑥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1页。

⑦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5页。

⑧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7页。

⑨ 焦延寿撰：《焦氏易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页。

如《倪彦思家魅》中，倪彦思深夜与妇语要除去狐，被狐偷听后反受其言语威胁：“汝与妇道吾，吾今当截汝屋梁。”^①小人得志的无赖模样跃于纸上。《宋大贤》中狐妖与人搏斗的同时言语间咄咄相逼“宁可行小熟啗”^②、“宁可共手搏耶”^③、“死！死”^④，展现了狐妖由稳操胜券到气急败坏的整个过程，狐易怒易暴的性格得到突出。《斑狐书生》中涉及的人物较多，语言描写更加丰富多彩。花斑狐狸与华表木用人类的语言进行交谈，过墓前问华表：“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无为不可。但张公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⑤花斑狐狸自负的性格展露无遗，不听好友劝告，一意孤行。张华怀疑书生是异类加以防备，但并不确信，这时斑狐书生心里有些许底气，出言讽刺张华嫉妒人才，不能学习墨家的兼爱精神，提携晚辈，企图用自己的口才之辩赢得生存，为逃离此地做最后的努力，可惜最终失败。桀骜不驯、爱逞口舌之辩的性格让它付出了生命代价。

狐故事语言表达呈现不同的风格。《狸客》中董仲舒一开始就知道访者非常客，但未影响两人之间的交流，狸客与董仲舒论及气象时，董仲舒才点破老狸的身份。“欲雨”^⑥二字虽然简短但符合狸居洞穴的生理属性，与文章开头设置的“非常客”^⑦这一悬念相呼应。《斑狐书生》中花斑狐狸以才貌自恃：“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无为不可。但张司空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⑧花斑狐狸与华表木之间的对话反映出狐自信满满和狂傲不羁的性格，华表木对世态人情的准确分析则反映出其性格的谨慎。斑狐书生才华横溢，能言善辩，致使鼎鼎大名的学者张华“无不应声屈滞”^⑨。张华博学多闻，知天下事，怀疑比自己略胜一筹的年轻书生非人类，书生以言语反击张华的失礼行为，表达自身的愤怒：“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⑩生死关头书生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4 页。

②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4 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4 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4 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⑥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8 页。

⑦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8 页。

⑧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⑨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⑩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依然巧舌如簧，虚张声势，最终惹怒了张华并殃及华表木。作者把斑狐书生塑造为一个勇于挑战权威，能言善辩，最终付出生命代价的清谈之士形象。在两篇狐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搜神记》开始重视语言描写，学问狐与他人、他物的对话中体现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和性格特点，使得狐形象更具立体性。

与秦汉狐妖形象相比，魏晋时期的狐性格更为突出，《搜神记》12篇狐故事中既有一心助人的“狸神”、“胡博士”，也有作恶害人的“庐陵亭狸魅”、“南阳亭老狐”，还有“句容狸妇”、“吴兴老狸”等狐性情未明确的故事。相对于其他狐形象而言，博学多闻，积极融入人类世界是狐形象新增的特点，如《狸客》中老狸主动上门与文坛巨匠交流学问显然不是传统题材的范围。董仲舒一开始就知来访者的不寻常，却没有立马拆穿，可见董仲舒的宽容，双方交谈十分愉快，最后董仲舒“戏之”^①，玩笑般的说出心中猜想，狸客遂显出原身逃跑。上门拜访的狸客十分自信，要知道与儒学大师交谈要有谈资，否则双方也不会“语遂移日”^②交谈甚久。老狸最后“色动形坏”^③，惊慌逃跑与之前“忽有客来诣”^④、“风姿音气，殊为不凡”^⑤，形成鲜明对比，为平稳流畅的故事发展添加了趣味。在《斑狐书生》中，花斑狐狸拜访张华之前十分狂傲不羁，“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⑥和“书生不从，遂谒华”^⑦。受到张华怀疑时，内心愤怒但还遵从礼节“言卒便请退”^⑧。最后被张华囚禁，出言讽刺张华的妒才行为“将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⑨，这显然是一位受到不公待遇，极力为自己辩解，控诉自身不满的下层学者形象。

狐在《搜神记》中妖性减弱，人性特点增加，它们化作人形，积极主动地融入人间生活。狐性格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是魏晋志怪故事进步的表现，尤其是学问狐性格：《狸客》中老狸知书达理，擅长交谈；《胡博士》塑造的则是一位喜爱读书，从容儒雅，好为人师的学者形象；《斑狐书生》中花斑狐狸的自信、善辩、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8页。

②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8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8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8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8页。

⑥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5页。

⑦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5页。

⑧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5页。

⑨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5页。

狡黠、咄咄逼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问狐在这几篇故事中人化程度超过其神性、妖性特点。狐在这些故事中只是普通的精怪，会被犬识破，会被人类杀害，后世作品中狐妖拥有救人性命、未卜先知、上天入地等高超法术未在文中体现。

二、情节的模式化

情节是小说的构成要素之一，它是表现人物之间关系的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过程，透过情节或直接或隐晦的表达作品思想主旨。六朝志怪中狐故事情节较为成熟，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现以《搜神记》为例，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征兆狐故事模式，这一类故事是继承了魏晋六朝狐能预测吉凶的文学传统。故事主要类型如下：狐出现——象征着某种或好或坏的征兆——在后文中得以验证。如《马化狐》中马异化为狐预示着天下大乱，是不详征兆。《淳于智卜狐》中狐的出现预示着夏侯藻家即将发生灾祸，后得以验证。《狸神》中狸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它提前告知刘伯祖的消息——得以验证。

二是狐作祟故事类型，包括害人、媚人、捉弄人等，分析如下：

害人狐故事大体表现为：狐欲取人性命——人类进行反抗——人狐之间恶斗——最终狐被杀。如《宋大贤》故事中宋大贤留宿亭楼，狐欲取其性命，宋大贤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进行反抗，人狐殊死搏斗，狐失败被杀。《庐陵亭》中情节与之相似：狐欲取得留宿者性命，汤应与狐恶斗，狐被杀。

媚人的狐故事则表现为：人为狐所媚——狐身份被识破——狐被杀或逃走。如《阿紫》故事中狐化作好妇状媚惑人，成功带男子到藏身之所，后居所被犬发现，狐逃跑。《句容狸妇》具体情节如下，狸妇幻化成人的样子迷惑路人，狸妇身份被识破，狸妇受伤逃跑，最后被杀。

捉弄人的狐故事表现为：狐捉弄人——人类想尽办法除怪——狐自行消失或被杀。如《倪彦思家魅》中狐莫名出现戏弄人，倪彦思想尽办法逐之，三年后狐自行离开。《吴兴老狸》中狐幻化成二男之父，融入家庭生活，几年后被道士识破真身，狐被杀。

三是学问狐故事情节模式，表现为：学问狐与人交谈或传授知识——受到人类的赏识——狐的身份被识破——狐逃走或被杀。例如《斑狐书生》中花斑狐狸与张华谈玄论道，张华败于下风，花斑狐狸身份最终被识破，被杀。《胡博士》中胡博士求学授课，获得人们尊重，后狐身份被识破。这个故事没有交代胡博士

的结局，依据魏晋除怪文化心理推测，胡博士可能会被杀死。

《搜神记》狐故事受到史书编写方式的限制，偏重于事实叙述，很少呈现高潮和波澜。各类狐故事有固定的叙事模式，但作者极力避免同题材故事的千篇一律，在故事的起因上下功夫。在狐媚人的故事类型中，呈现出狐媚人——狐现出原形——狐被杀或者逃走这一条主线。尽管是同一题材的故事，狐媚人这一类型的故事在作者笔下也有不同的起因，如《阿紫》故事中狐“作好妇形”^①上门魅惑士灵校，多次招之，“忽然便随去，即为妻”^②，雌狐成功魅惑了该男子。《句容狸妇》故事中狸妇幻化成女子，尾巴幻化成婢女，但笑不语，行为古怪，引起农夫的怀疑，被镰刀斫伤，后被人捉住。《句容狸妇》中狸妇是不是故意这样做以达到迷惑人类的目的，在故事中没有明确的体现，但《阿紫》中雌狐目的明确，这是这两篇故事的不同之处。作者尽量把同一类型的故事进行不同叙述，以增加故事多样性。在学问狐故事类型中，呈现出博学的狐与人交流学问或把知识传授与晚辈——狐的身份被识破——狐逃走或被杀这一主线。在《狸客》中，“忽有客来诣”^③，狸客主动上门求见董仲舒，“与论《五经》，究其微奥”^④，直到董仲舒戏言其真实身份，“化为老狸，蹶然而走”^⑤。《胡博士》中老狐自称胡博士“以经传教授诸生，假借诸书”^⑥，几年后发现其于空冢处教授诸狐。《狸客》中狸以客人身份主动上门与大学者切磋学问，求得自身的发展，而《胡博士》中狐一出现就已经获得了受人尊敬的师者身份，以教授诸生为业。虽然两篇故事同属于学问狐故事，但单纯的学者与教授诸生的师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就注定了狐故事书写意图的不同。

狐狸幻化人形这一情节在狐故事中较为普遍。《搜神记》中共有 12 篇狐故事，其中一部分狐精怪化了，在巫术迷信横行，“物老成精”^⑦之说影响下，狐成为精怪大军中的一员，成为诡异、邪恶的载体，如《庐陵亭》、《宋大贤》等故事，狐积年获得超自然能力，成为了人类不能支配甚至感到害怕的恶魔，“南阳西鄂有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1 页。

②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1 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8 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8 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8 页。

⑥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2 页。

⑦ 王充著：《论衡》，岳麓书社 1991 年版，第 348 页。

一亭子，人不可止，止则害人”^①“庐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则死”^②，亭子是人类为休息搭建的建筑，却被狐妖占为己有，还把闯入其中的人类杀掉，可谓蛮横无理至极。另外一些狐故事是为了强调狐人化的趋势，除了《阿紫》故事中人类因为与狐长久相处，退化“兽形”外，其他狐故事都是狐幻化成人形进入人间。至于幻化人形的方法在唐传奇中多有涉及，如《太平广记·僧晏通》这样写道“……乃取髑髅安于其首，遂摇动之。……乃褰擷木叶草花，障蔽形体，随其顾盼，既成衣服。须臾，化作妇人，绰约而去。”^③《酉阳杂俎》中也有类似的狐化人的方法，“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④《搜神记》中还未提及。狐化人形又可分为几类：一是借助人形幻作美女迷惑世人，如《阿紫》、《句容狸妇》变作美女媚惑男子；二是借助人形方便作恶，如《吴兴老狸》，老狸化作二男父亲打骂之，后化作人形住进了二男家中；三是化作人形方便交流，如《胡博士》变作人形教授学生，《斑狐书生》化作人形拜访张华。幻化情节是狐故事内容之一，在学问狐故事中必不可少，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从《搜神记》狐故事可以看出，在文学发展的数百年间，狐个性凸显，作品篇幅变长，故事情节由简单发展到复杂，不再单一和线性化，这些都归功于作者突破自我的想象，他们在平淡的叙述中努力增添叙事色彩，使得狐故事向千奇百怪、摇曳多姿的方向发展，为后世众多狐故事创作者提供了书写经验。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3 页。

②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9 页。

③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3691 页。

④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44 页。

第二章 狐故事的独特性

狸客的谦虚好学，胡博士的好为师表，斑狐书生的真才实学在众多狐故事中独树一帜。它们个性不一，或沉稳，或谨慎，或狂傲，人性突出，妖性渐隐，不再肆意危害人间，并对生活有更高的追求。狐故事还涉及了文学大师董仲舒和张华，他们用平生所学识破狐真身，提高了狐故事中人的地位和价值。本章所要探讨的就是《搜神记》中这些独具特色的学问狐故事。

第一节 凸显人性

《搜神记》学问狐故事呈现人性化趋势，狐形象从崇高神秘到自然平实，世俗趣味增加。学问狐故事是作者虚构幻想的，但狐人情世态化的描写反映了现实社会，作者干宝借助学问狐故事批判社会和表达希冀。《搜神记》狐故事以男性形象为主，以男狐为主角的故事中又以学问狐故事最具特色，这类故事中狐博学多才，热衷结交名士，好为师者，不同于以往危害人间、害人性命的狐妖形象。

学问狐故事展现出的儒雅、从容、狂傲的性格特征基本上反映了魏晋文坛学者的基本特点，拜访大家，学术沟通，教授诸生是魏晋知识分子日常行为，如《世说新语》所载：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言语》）^①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言语》）^②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言语》）^③

学者之间虽远隔千里也要登门拜访，名士们聚集在一起谈古论今、说玄论理，展开学术交流，家族内有学识渊博的长者教导晚辈，可谓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胡博士》、《斑狐书生》故事正是对魏晋名士日常生活的真实反映。胡博士以教授诸生为己业，无论是人类学生还是同类的晚辈，它都兢兢业业，九月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④之时，它依然在传授知识。见人类的到来，也不惊慌失措，从容面对，“老狐独不去”^⑤这一行为充分展现了一位学者应有的大师风范，值得人

①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6 页。

②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6 页。

③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72 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2 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3 页。

类尊敬。《斑狐书生》中风流倜傥，狂傲不羁的花斑狐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出众的外貌引人注目，自信和狂傲的人格魅力令人折服，“举动容止，顾盼生姿”^①，像极了《世说新语》一众名士展现出来的自信、机智、狂傲的个人风采：

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言语》）^②

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言语》）^③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言语》）^④

魏晋名士善言、机智，毫不掩饰自己的锋芒，也不吝惜对他人的赞誉，耿直自信，展现了独特的时代风貌，尽管结局和花斑狐狸一样悲惨，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学问狐与《搜神记》中其他男狐故事相比，少了一丝妖性，多了一份人情。学问狐有其自身的动物习性：聪明、喜欢幽静之所，但更多地是具有人间知识分子的学识与气质，它们学习人类的知识，混迹人间，追求名誉，获得职业，充满了世俗化。它们有人类的性格特征，如花斑狐狸自负满满，不听朋友劝告；与张华谈古论今，毫不谦让，“华无不应声屈滞”^⑤，堂堂大师败于下风；遇到危险无法脱身时，依旧虚张声势：“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⑥以口舌相讥张华，毫不屈服和退让，这便是花斑狐狸不同于以往狐精之处，像极了魏晋时期的狂傲名士，以自己的学识和口才使他人屈服。《世说新语》中多处记载了魏晋名士的轶事：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为孝武所器。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鸢革响。淳酪养性，人无嫉心。”（《言语》）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② 徐震堃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56 页。

③ 徐震堃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56 页。

④ 徐震堃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73 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⑥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①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言语》）

②

名士张天锡和毛伯成在遭遇不公待遇时奋起反抗，用智慧捍卫了自己的权利和生命，魏晋名士是这样做的，花斑狐狸也是这样做的，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斑狐最后的死亡验证了人类排斥异类的事实，张华虽然杀害了花斑狐狸，也为之叹息“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③，学问狐知书识礼、谦虚谨慎、求学问的种种人类行为可以和谐的融入人间，但难以纠正人类对于异类的看法——除之而后快。《搜神记》中狐善于变化，滥用法术，危害人间的种种神性或妖性特征在作者笔下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它们的人性特点。事实上，作者并没有把学问狐当作精怪对待，它们俨然是魏晋清谈之士，求知、传道、自负、愤怒、谦虚，种种言行情感完全符合人间学者的特征，充满世俗味，人性特点更加鲜明。

第二节 重构人狐关系

人与狐的关系往往是对立的，如《列异传·狸鬣》、《玄中记》中狐害人、人杀狐的敌对关系。在《搜神记》12 则狐故事中，一部分狐故事依然遵循旧有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人狐关系紧张；而另一部分狐故事，尤其是学问狐故事，干宝试图尝试一种新的人狐关系——狐不再害人，重构人狐关系。

狐是真实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动物，它们本性警觉，动作灵敏，喜欢幽静，而在人们的想象中它们成为了会法术，爱杀人，喜欢作恶，危害人间的精怪，如《阿紫》中狐妖魅惑人间男子；《倪彦思家魅》中狐耍无赖，威胁人们的正常生活；《狸神》里狸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宋大贤》中因狐作怪，“人不可止，止则害人”^④；《庐陵亭》中狸精伙同其它精怪害人性命；《吴兴老狸》间接害死二男父亲。这些经过作者想象构造出来的狐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致使人狐关系紧张。

《搜神记》中狐到人间的目的多为危害人类，故事中的狐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害了人的性命，总体来说狐是恶的化身，是不祥的征兆，它们或魅惑人或给

① 徐震堃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83 页。

② 徐震堃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84 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6 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3 页。

人带来疾病和战乱或直接害人性命，这些明显的负面影响不必多说。还有一些狐故事，狐的行为看似无害甚至有益于人的生活，但如果任由事件发生发展，最终也不会有圆满的结局，如《淳于智卜狐》中淳于智的解祸之法：“在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①在狐嗥叫处痛哭直到全家走出即将倒塌的房屋为止，救了全家人的性命，在此处狐是解除祸患的重要线索，可是谁又知道这次的祸患是不是这只狐狸引起的呢；《句容狸妇》中狸化作人形在田间走动，却被农人无辜斫伤，可倘若这只狐狸是为了熟悉人间的情况以便今后魅惑人，那么它被捉就不值得怜惜了；《狸神》中狸神总是预先告知刘伯祖京城下达的诏书内容，还告诉刘伯祖宫闱秘事，这些行为有害死刘伯祖的潜在危险，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所幸的是狸神及时离开了。由此可见，这些狐都对人类有或多或少的危害。

而学问狐虽然看不出它们的好坏，却没有明显或隐含的害人目的和行为，它们以积累知识或传道授业为毕生追求，即使长期混迹人间对人类也没有危害。学问狐形象都是正面的，是因为干宝对学问狐有一种身份定位——作为知识分子有树立道德榜样和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身份定位决定了学问狐只能以正面形象出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位学者渴求的目标，学问狐故事中狐首先做到的就是修身，博学于文，并约之以礼，学问狐们经过多年的学习，具备了沉稳、从容、睿智、潇洒的气质，进行切磋学问、教授诸生等人类行为，既有魏晋名士的风流潇洒，兼具传统士人的知书识礼，与作者生活接近，是作者依据实际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不同与一般的狐故事。

作者在学问狐故事中尝试构建一种新的人狐关系，由互相敌对改为和平共处。狐主动上门拜访，希望得要延誉，获得声誉，甚至是战胜人类精英，获得一种成就感，未曾害人性命，如《斑狐书生》中斑狐“积年能为变幻”^②，乃变作一个“总角风流，洁白如玉”^③的书生拜访大学士张华，张华见其“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④。这位书生与张华“论及文章，辨校声实”^⑤，张华闻所未闻，双方相见恨晚，进行了更深层的学术交谈，“复商略三史，探颐百家，谈老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69 页。

②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撷五礼”^①，张华一时语塞，败下阵来，然而这只千岁天狐终被张华识破，死于非命还累及华表木。故事中狐妖变化的书生俨然一副风流才子模样，不仅知识广博，而且能言善辩，它凭借丰富的知识打败张华。从赢得对方赞赏到被识破真身悲惨死去，表达了人类对精怪的恐慌和铲除异己的决心。但精怪对人类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再单纯为了作恶进入人间，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追求，更具人化特点。爱好学问的人物设定使得精怪素质有了整体提高，又或者是这些狐妖想要真正的在人间长久的生活，如《胡博士》中那只化为“皓首书生”^②的老狐不仅“教授诸生”^③，“假借诸书”^④，而且还集群狐于空冢之中，为其讲书。老狐不仅加强自身文学素养，还乐于传道，教导晚辈，获得了受人尊敬的职业和生活，可以在人间长久的生活下去。

学问狐故事的意义在于，它除了继承文学中狐化为人的特点外，又对人狐关系进行一种新的尝试，开创了学问狐故事模式，为后世写狐故事的作家开拓了新的构思空间，像《聊斋志异·雨钱》、《萤窗异草·谈易狐》、《夜谭随录·陆水部》、《子不语·狐诗》、《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野狐听经》、卷六《滦阳消夏录六·应举之狐》等作品中的狐都是知书识礼的形象。而《胡博士》中的书生形象和《阿紫》中狐媚人情一样，成为后世狐故事创作的模式，在小说中常以“胡博士”、“阿紫”之名称呼小说中的狐，可见影响之深远。

第三节 展现时代风貌

《搜神记》12篇神奇怪异的狐故事都较好地表现了狐妖们的特殊性情，无论是展现狐的神威，还是批判它们祸害人间的恶习，亦是通过狐故事突出人的智慧、勇敢，每篇故事中的狐妖都个性十足，特别是学问狐故事，所要表达的主题与整个时代息息相关。学问狐故事中不仅人的地位有所提高，而且精怪人化特征明显，它们像人类一样追求自身的价值，展现了魏晋自信、张扬的时代风貌。

学问狐故事中着墨最多的就是狐这一形象，有对它们外貌的描写“总角风流，洁白如玉”^⑤，“有一书生，皓首，称胡博士”^⑥；有对它们神态的描摹“举动容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5页。

②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2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2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2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5页。

⑥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2页。

止，顾盼生姿”^①、“风姿音气，殊为不凡”^②；有对它们行为的叙述“群狐罗列，见人迸走，唯有一老狐独不去”^③、“忽有客来诣”^④，多种写作手法更加全面、生动地塑造了狐这一角色。因为狐上门求谒是为了研讨知识，所以言语描写在整个故事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胡博士》中未涉及狐狸的言语；《狸客》中有“欲雨”^⑤二字；《斑狐书生》里言语描写最多，故事以花斑狐狸为中心，围绕它的言行举止展开故事，人类在狐故事中成为了配角，故事中其他的角色也都为塑造狐形象服务。《胡博士》中虽然没有对狐言语的描写，但故事跟随胡博士隐秘、飘忽不定的行踪展开：教授诸生——忽复不见——山中闻讲书声——群狐惊走、老狐独不去，胡博士是名副其实的主角担当。

其他狐故事中狐不是主角，只是起到了陪衬的作用，如《淳于智卜狐》、《狸神》、《马化狐》中狐这一角色一笔带过，狐似乎只是一个名称，如果换做其他的动物，故事也可以进行下去，列举关于淳于智的两篇小故事：

谯人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淳于智，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愁愕，遂驰诣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后其祸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淳于智卜狐》）^⑥

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相为，使之反死。”乃以朱书其手腕横文后三寸为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卧。其明，有大鼠伏死手前。（《淳于智筮鼠》）^⑦

两则故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基本处于同一故事模式，即家中有人得病或动物作祟，求救于占卜之人——淳于智，获得淳于智的帮助，最终免除祸患。在这一模式中，故事中的动物可以是狐狸，可以是老鼠，当然也可以是猴子、犬等，动物只是构成整个故事的一个普通元素，可有可无，完全可以被替换。而且故事的重点是为了突出淳于智的占卜本领，叙事的重点也是如何破解危机，救人性命。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②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8 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3 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8 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8 页。

⑥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69 页。

⑦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68 页。

所以《淳于智卜狐》中狐角色只是为了构成故事的完整性，与我们重点研究的学问狐有很大的不同。

有些故事中狐角色占据很大的篇幅，如《倪彦思家魅》中整日作恶的无赖狐；《吴兴老狸》里作弄二男，导致农户家破人亡的老狸；《狸神》能未卜先知，隐藏真身的狸神，狐在故事中不可或缺，但引人注意的是狐异于常人的妖性或神性。而学问狐故事中狐是真正的主角，它们拥有与人一样的地位和行为，故事也是围绕它们展开和结束，虽然最终的结局与一般狐故事大致相似，但学问狐故事与其他狐故事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完全不同。

人类对狐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仍然受原始狐崇拜思维的影响，而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发展，人地位的上升，巩固人类在万物首要地位的思想越发明显。排除异己，除妖除恶行为增多，无论精怪多么有才，善于伪装，最终还是被人类识破，这既宣扬了魏晋精怪观念，也反映了“人的自觉”这一社会思潮。故事中竭力凸显人、张扬人的现象表达了人的地位上升这一时代主题，在动乱时期，思想领域相对宽松，人们无力关注外部世界，于是投向关注自我，人类的自我价值得到重视与肯定，反映到狐故事中就是张华那种肯定自我的自信风度。张华热情接待后辈晚生，即使在论辩过程中哑口无言也没有生气，怀疑书生是精怪后相信自己的直觉，步步为营，谨慎取证，获得确切答案后才采取行动，从而烘托出张华的博学多识，谨慎多谋，达到赞扬张华学识、赞美智慧的力量。

故事主题除了赞扬人类战胜精怪的超凡智慧之外，还有一层主题：精怪人化特征明显，狐像人一样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狐花费千年的时间吸收天地精华并学习人类智慧，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实现着作为人的自觉。老狸风度翩翩，谦虚好学；胡博士从容稳重，教书育人；斑狐书生博识精辩，风流潇洒，它们自信而多才，作者对它们的态度与其他精怪不同，对它们十分赞扬、肯定。学问狐自身的魅力不仅使得董仲舒、张华、诸生折服，还深深的打动了读者。

第三章 狐故事的意蕴

狐被后世视为智兽，它们的机智、狡猾、多疑凸显其智慧，因此狐就与充满智慧的学者形象结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学问狐故事。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狐故事也来源于社会生活，反映一定的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干宝《搜神记》

中几篇狐故事窥见当时的社会状况。

第一节 重现好学盛况

文学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风气，狐故事也是如此，如先秦时期为了生存而重视动物属性的狐故事；秦汉之际谶纬之学的盛行衍生出许多充满神性的狐故事；在崇尚学问和清谈的魏晋时期，小说中出现了善于探讨、传授知识的学问狐故事，东晋干宝《搜神记》中《狸客》之老狸、《胡博士》之老狐、《斑狐书生》之花斑狐狸便是其中的典型。《狸客》故事强调的是老狸主动上门交谈学问之事，故事中的老狸知书达理，擅长交谈；董仲舒博学识才，宽厚待人。《胡博士》中老狐钻研学问，热衷于教授诸生。《斑狐书生》所叙花斑狐狸博闻善辩，风流潇洒；华表木深知人情世故，智慧超人；张华博学谨慎，慧眼识怪。三篇学问狐故事中的角色各具特点，无论是精怪还是人类都是智慧博学的知识分子形象，甚至是社会上知名的文坛学者，大儒。整个社会营造出一种崇尚学问的好学之风。

魏晋时期是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但依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宗白华先生所言：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郦道元、杨炫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閤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魏晋时期值得炫耀的文学艺术成就是丰富的，而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是受教育。魏晋人形成好学之风有各方面原因，一是从客观来看，社会动乱，人生无常，人们对生死有了新的认识，更加重视享受当下，努力增加生命的宽度，除了无止境的物质享受，还需要知识填补精神空虚，形成学习欲望；二是魏晋知识分子从僵固的儒学束缚中努力挣扎出来，旧的思想体系的解体意味着需要新的思想、知识来填补空白，于是建构新的知识体系、重新定义人的价值的内在需求促使魏晋时期营造出了一种好学的时代风气；三是玄学的盛行，要求清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7 页。

谈之士参悟高深玄奥的老庄思想，有时需要与儒学、佛学融会贯通，王褒在其《幼训》中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行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梁书·王褒传》）^①要求家族子弟兼修儒释道之学，掌握足够的知识量。再者教育是一国之本，一旦社会安定下来，国家会重新提倡教育，培养人才。九品中正制度的盛行只是满足了从高门大族中选拔高官重职之需要，为数众多的基层官员还要在具有一定知识的庶族或寒门中挑选，“学而优则仕”具有现实价值。

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社会风尚标的士族，特别是名门望族，良好的学识至关重要。一方面统治阶级政权的维护需要世家大族的支持，因此在各种政策都有所倾斜，如上文提到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和体现士族特权特设的国子学；另一方面，有学识在这一时期不仅关系着个人的前途，更重要的是与家族命运紧密联系。正如田余庆先生曾说：“非玄非儒的纯以武干居官的家庭，罕有被视作世族者。”^②魏晋世族无论是旧族还是新起门户，他们在政治、教育中享有垄断权，大家族已经意识到文化优势对自身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因而世家大族大多世代重视家族文化修养，形成以学识著称的文化世家，如颍川荀氏：自东汉荀淑起开始发迹，后代中出现了许多名士，如荀悦、荀彧、荀彧、荀顗、荀勖、荀绰等均才学显名于世。范阳卢氏、吴郡陆氏、顾氏、张氏，会稽贺氏、孔氏、虞氏、琅琊颜氏等都是以文学传世的高门大族。陈寅恪先生指出：“具备高官及才学二条件者，为其理想之第一等门第。”^③而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是王谢两大家族，如唐代羊士谔《忆江南旧游二首》中写道：“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全唐诗》卷三三二《羊士谔》）^④王氏家族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名人有王导、王敦、王旷、王羲之、王献之等。沈约曾说过：“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南史·王筠传》）^⑤王氏家族可谓人才辈出。与之比肩的谢氏一族也不甘示弱，今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选本可以见到谢安、谢万、谢混、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等十余人的诗文创作，可见谢氏一族文化素养之高。

① 姚思廉撰：《梁书》，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584 页。

② 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

③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14 页。

④ 彭定求等校点：《全唐诗》，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3696 页。

⑤ 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611 页。

国家政策的倾斜以及世家大族践行的好学之风，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这也反映在干宝《搜神记》学问狐故事中。《狸客》中董仲舒独咏，“忽有客来诣”^①，狸客若没有真才实学，怎敢贸然打扰儒学大师董仲舒？要知道董仲舒弟子众多，很多人慕名而来却从未见过自己的老师，“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汉书·董仲舒传》）^②，可见董仲舒学识之深，声誉之高。故事中董仲舒与老狸“戏之”^③，两人相谈甚欢，甚至开起了玩笑之语。“下帷讲诵”典故演化而来的学问狐故事、他人慕名拜访以及学者之间的文化交流等社会现象，侧面体现出当时的好学之风。

《史记》、《汉书》记载董仲舒为学异常勤奋，王充《论衡·儒增》载：“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④桓谭《新论·本造》言：“董仲舒专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⑤周桂钿先生认为“不窥园”这个问题值得推敲，他认为《史记》、《汉书》、《论衡》等书都只说了“三年”，王充认为董仲舒用三年时间成为儒增已经夸大了事实。唯独桓谭说他“年至六十余”不窥园，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董仲舒活到60多岁没窥过园。根据常识，这种说法不通。还有一种解释，董仲舒到60多岁时曾有三年时间不窥园，这是一种较好的解释。^⑥从这可以看出，董仲舒直至60多岁，仍然不放弃学习，以至于三年时间未曾进入园子。董仲舒的勤奋好学在历史上留有佳名，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楷模。勤奋好学取得的成绩就是董仲舒学精通百家之言，善文善言。《汉书·儒林传》载：“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⑦“文说美善，博览膏腴”^⑧，王充说：“董仲舒者，文之乌获也。”^⑨喻之为文章圣手。董仲舒博闻多见，熟知世间稀有之物，如“知重常”^⑩。他还具有优雅的言谈举止，“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汉书·董仲舒传》）¹¹。不仅如此，董仲舒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乐意把毕生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8页。

② 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5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8页。

④ 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29页。

⑤ 桓谭著：《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

⑥ 周桂钿著：《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⑦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7页。

⑧ 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12页。

⑨ 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03页。

⑩ 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12页。

1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5页。

所学教授他人，《史记》载“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董仲舒传》）^①，他弟子众多而且都很出色。这样一位自身素养极高，又积极培养下一代的学者正与《狸客》故事中与狐为善，乐于交谈的学者形象相符。这也是作者干宝把董仲舒写入狐故事的原因之一。

《斑狐书生》中那位凭借自己的学识识破精怪并将其擒拿扑杀的张华也是一位好学且博闻之人，史书记载“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晋书·张华传》）^②博览各方书籍，知天下之事；张华喜欢收集书籍并用心阅读，“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筐”（《晋书·张华传》）^③，书籍在其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张华书籍众多，就连编撰史书的挚虞都要“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晋书·张华传》）^④，搬家时要用三十辆车装书；张华对世间奇闻怪事了若指掌，因此才会笃定的说出自己的怀疑“天下岂有此少年！若非鬼怪，则是狐狸”（《晋书·张华传》）^⑤。《晋书》中记载的张华也是一位博学之士：

惠帝中，人有得鸟毛三丈，以示华。华见，惨然曰：“此谓海鳧毛也，出则天下乱矣。”陆机尝饷华鲈，于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还问鲈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鲈，过美，故以相献。”武库封闭甚密，其中忽有雉雏。华曰：“此必蛇化为雉也。”开视，雉侧果有蛇蜕焉。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帝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张华传》）^⑥

张华除了知道一些别人不曾知道或很少人知道的奇闻怪谈之外，还博古通今，知四海万事，“时人比之子产”（《晋书·张华传》）^⑦，世人对张华的评价是极高的。

《斑狐书生》中张华与狐狸：“论及文章，辨校声实”^⑧，双方对史书记载，百家之言进行探讨，又谈及老庄风雅，对古今各种学识进行了切磋，倘若不学习，怎可如此熟识这些知识呢？故事中张华怀疑书生是狐狸，却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① 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129 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68 页。

③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74 页。

④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74 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⑥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70 页。

⑦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74—1075 页。

⑧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而是有所防备，掌握狐狸的心理，认为它是已有千年寿命变幻而成的“千年老精”^①，最后用千年华表木验证其真身，可见张华性格谨慎。通过雷焕和张华的对话突出张华学识更胜一筹，文中雷焕言“闻魑魅忌狗”^②，张华更是知道千年狐狸不畏犬：“千年老精不复能别”。^③在雷焕的陪衬下张华博学的形象更为突出。张华与雷焕是好友，《晋书·张华传》记载了这两位至交的另一则小故事：西晋灭吴之后，在斗宿和牛宿之间出现了预示兴盛的紫气，于是张华找到好友雷焕观察星象，并派遣雷焕亲自去取宝剑，找到龙泉、太阿两把宝剑，两人各得一把，张华被杀害时宝剑丢失，雷焕的宝剑也坠入水中化为神龙长啸而去。张华能在他人不以为然之处发现异常，托付自己的好友雷焕去寻找，果不其然找到了两把宝剑，雷焕以南昌土擦拭宝剑并预测了张华和宝剑最后的结局，可见雷焕也非常人。而张华认为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并预言两把宝剑终将合，这些言论在事件中得到一一验证，华之博闻名副其实。

学问狐故事验证了好学之风的盛行，重现魏晋好学盛世，这些狐热衷于读书论道，传授知识，是精英中的精英。同时学问狐还衬托出大学者董仲舒、张华的博学多闻，机智冷静。他们孜孜不倦地研习古今学问，才能一眼识别精怪，充足的知识给予他们辨别事物的能力并自信的证实自己的观点。

第二节 反映清谈风气

《狸客》中的老狸和《斑狐书生》之花斑狐狸的形象很特别，有清谈名士的风采。《狸客》“风姿音气，殊为不凡”^④。《斑狐书生》“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⑤。它们器宇不凡，风流潇洒，善于论辩，俨然一副清谈名士的形象，实际上是清谈风气在学问狐故事中的反映。

玄学始于魏晋，因高门名流的提倡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达官名士以老庄为宗，“初，注庄子者数十家”（《世说新语·文学》）^⑥，如魏晋之王弼、何晏、山涛、阮籍、嵇康、向秀、郭象，宋之李叔之，齐之祖冲之，梁之严植之、刘昭，陈之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②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8 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⑥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11 页。

周弘正、徐陵，北魏之程骏、邱晏，北齐之杜弼等。当时君主也莫不嗜老庄，如魏武帝注子书，梁武帝制《老子讲疏》，梁简文帝制《老庄法定莲譬》诸书，梁元帝制《老子讲疏》等，社会主流阶层学习《老》、《庄》之风蔚为大观。在清谈之风盛行的大背景下，鬼怪妖魅化身学者形象与清谈高手一较高下，如汪绍楹本《搜神记》卷十六《阮瞻》条有载：

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①

故事中的鬼与名士阮瞻谈玄论理及言鬼神之事，可见其也是一位清谈高手。《搜神记》完全取材于《晋书·阮瞻传》，刘义庆《幽明录》和殷芸《小说》亦载此条，只是文字略有改动。除此之外，殷芸《小说》卷九《晋江左人》之“宋岱”条记载了类似的故事：

宋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甚精。……后有一书生葛巾修刺诣岱，与之谈甚久，岱理未屈，辞或未畅，书生辄为申之。次及无鬼论，便苦难岱。岱理欲屈，书生乃振衣而起……^②

这是关于异类与人论辩清谈之事。其中，异类一方“甚有才情”或“甚有才辨”，人类一方“物莫能难”或“甚精”，双方都是异界或人间的精英，是高手中的高手，发生在这两者间的论争便是高手之间的对决，而论辩内容则是关于“名理”、鬼神之事，如实反映了魏晋时期论鬼神、谈老庄之风气。此风波及甚远，在作者的想象中此风甚至波及异界，《斑狐书生》中写道：

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比复商略三史，探颐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撻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③

文中提及的良好的容貌，从容的举止，渊博的知识等备受人们的青睐和重视，这是玄风带给魏晋人的正面影响，即魏晋风采。专门记录魏晋名士风采的著作《世说新语》就是很好的证据，其中《容止》一章专用以展示魏晋名士出众的容貌和

①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89 页。

李剑国本因为未见此条出自《搜神记》，故未辑入，只在《附录》中出现。

② 殷芸撰、王根林校点：《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2 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5 页。

独特的神情，如形容容貌的例子有：何晏“色转皎然”^①；嵇康“萧萧肃肃，爽朗清举”^②；庾亮“风姿神貌”^③，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④等。形容神情的例子有：嵇绍“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⑤；刘伶“悠悠忽忽”^⑥；庾亮“丘壑独存”^⑦；王濛“何其轩轩，韶举”^⑧等。魏晋名士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畅谈玄远、无所顾忌的狂士群像，还有一种异常自信、勇于展现自我才华的气度。这正是干宝《搜神记》学问狐故事中所表达的出的主题之一。

但清谈之风盛行对政权统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干宝是反对清谈之风的，他认为西晋亡国与崇尚玄学清谈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其在《晋纪·总论》中大力抨击了魏晋之际玄学风气：

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文选》）^⑨

玄风的盛行给社会带来了不良风气，传统的儒家礼节和规范被弃置一旁，社会上空谈大论，刻意放达的行为比比皆是，影响到了政治统治。除干宝外，魏晋有识之士也看到玄风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晋书·裴頠传》云：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⑩

这种玄学清谈的风气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是在思想上产生了与有章可循的儒家礼教相对立的自然放任思想；二是在实际生活中，这种重虚玄而不重实学的思想和风气也对社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魏晋名士以荒诞不羁的“行为艺术”标榜自我。儒家价值观中忠孝仁义的道德修养、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等内容是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的详细规范，对人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①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33 页。

②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35 页。

③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39 页。

④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40 页。

⑤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36 页。

⑥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37 页。

⑦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39 页。

⑧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41 页。

⑨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86 页。

⑩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44 页。

用，而玄风的盛行，导致世人失去了做人做事的准则。魏晋之前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到了魏晋时期，针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遵循不同的处事原则。如阮籍母丧期间一反传统礼教：“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世说新语·任诞》）^①这种做法遭到传统礼教之士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阮籍应该受到惩罚：“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世说新语·任诞》）^②有人则对这种行为不置可否，认为礼教是俗人遵守的俗礼，阮籍是高人，做法自然和俗人不同：“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世说新语·任诞》）^③关于丧葬，古代礼法有明确规定，守丧礼法不仅规定了时间，而且对守丧之人在服饰、居住、娱乐、饮食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且不食肉不饮酒，如《论语》所载：

宰予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汝）安乎？”曰：“安。”子曰：“予之不仁也。”^④

到了魏晋时期，这一明门规定起了争议，整个社会充满了混乱。清谈之气导致行为准则混乱，《世说新语》记载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依然十分荒诞的行为：与猪共饮的阮仲容、喜欢裸身的刘伶、公然抢劫的祖车骑、目无尊长的王子敬等，他们不休边幅，不顾俗礼，肆意破坏公众道德法规，作出种种反常行为，当事人依然淡定自若，无是非观念，羞耻之心，甚至失去了做人的底线。虽有力的反抗了礼教的束缚，但矫枉过正，反而产生了负面效应，使社会行为规范混乱，造成全民化影响：

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黷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

①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3页。

②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0页。

③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4页。

④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31—1237页。

国势如此。（《文选·晋纪总论》）^①

世风日下，是因为缺乏儒学的教化作用，因此干宝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顺乎天而享其运，应乎人而和其义，然後设礼文以治之，断刑罚以威之，谨好恶以示之，审祸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笃慈爱以固之；故众知向方，皆乐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廉耻笃于家闾，邪僻销于胸怀，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义，又况可奋臂大呼，聚之以干纪作乱之事乎？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长久也。（《文选》卷四十九《晋纪总论》）^②

干宝主张以礼、文治天下，使民众明好恶、知廉耻，才能乱不作，国长久。儒学的特点是积极入世，关注现实人生，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理论与君权统治完美契合，也就是说儒学崛起的条件之一是现实的需求和领导者的倡导，这也是干宝把董仲舒写入狐故事的原因之一。

董仲舒时期，儒学的发展有良好的机遇。西汉统治者采取宽松的文化政策，文化气息滋长，从世人不学史书到未及冠之时已经熟读四书五经，整个社会儒学氛围良好。包兆会在《西汉初中文艺思想研究》中写道：文帝时拜儒学大师申公和韩婴为博士，景帝时，《诗》、《书》、《春秋》、《孟子》、《尔雅》、《孝经》儒家经典都设有专门的博士。许多皇室子弟拜这些大儒为师，种种做法提高了儒学的地位，为以后儒学获得独尊地位创造了条件。^③窦太后死后，儒学得以真正复兴，如司马迁言：“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④儒学士子得以封侯称相就是对儒学的巨大支持，这得力于统治者的扶持。历史上的汉武帝爱好文学，崇尚儒术，他在位时期西汉人才鼎盛，《汉书》称赞云：“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87—2189 页。

②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81—2182 页。

③ 包兆会著：《西汉初中文艺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3 页。

④ 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118 页。

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①真是人才济济，整个社会呈现积极向上的发展趋势，成就了汉武盛世。干宝羡慕董仲舒所处的人尽其才的时代，所侍奉的开明能干的君主，所实行的学而优则仕的用人政策，所倡导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氛围，这些是干宝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干宝还被董仲舒自身的魅力吸引，董仲舒自身勤奋好学，在自己习得充实知识后悉心教导后辈，为国家培养大量的人才，有振兴儒学的决心和拯救国家的信念。

《斑狐书生》中与斑狐书生有精彩对决，识破其异类身份并将其杀死的大学者张华以博学多识闻名当世，著有《博物志》十卷，《晋书·张华传》载“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贍多通”^②，张华通览、收藏各类书籍，被害后，“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筐”（《晋书·张华传》）^③。可见，张华的知识系统庞杂且勤奋好学，魏晋流行的玄学和传统的儒学理念都应有所关注。我们可以从《世说新语》中得以验证：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言语》）^④

刘令言始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张茂先我所不解……。”（《品藻》）^⑤

荀鸣鹤（荀隐）、陆士龙（陆云）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张乃抚掌大笑。（《排调》）^⑥

魏晋清谈名士举办的清谈盛会，张华位列其中，但从以上几个小故事中并未发现张华发表清谈见解，谈论的是《史》、《汉》等史学著作。由此观之，张华思想杂糅，但以儒学为重。

《狸客》中董仲舒的学识高于老狸；《斑狐书生》里风流倜傥的花斑狐狸最终被张华扑杀；《胡博士》故事有尊师重道的礼节和临泰山而面不改色的从容。从学问狐故事内容和主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作者支持儒学。干宝反对的不是崇

① 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638 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68 页。

③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74 页。

④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6 页。

⑤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77 页。

⑥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24 页。

尚老庄的玄学，而是过分炙热，以致背离玄学初衷的、以清谈为名作出的种种荒诞行为，因此他把儒学大师董仲舒、文坛巨匠张华、好为人师的胡博士写入狐故事中，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以此深化故事含义。

第三节 认同除怪文化

从狐故事的结局来看，狐是悲惨的，它们或死或逃。人们尊敬和佩服有学识的人，倘若这些学者是精怪幻化而成，便立即遭到无情诛杀。干宝虽然肯定学问狐的学者身份，但也认同社会上流行的除怪文化。

学问狐故事中的老狸、花斑狐狸、老狐都变幻成人的样子或求谒或授学，与人的样子相差无几。那么狐狸为什么可以能变幻成人的样子呢，王充《论衡·订鬼篇》解释道，“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①。古人有“老物成精”之说，只要物足够老，无论是无生命的物体，还是有生命的动植物，都可以成为精怪。《搜神记·五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依凭，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②老物能成精，是由于它们长年累月吸收天地灵气，物的本质发生变化，养育成“神”，成精的老物便能化为人形。小说中狸客、斑狐书生、千年华表木以及胡博士都已经具备“千岁之质”，有足够的力量幻化成人形。精怪变化的原因，干宝在其他的篇章中也有论述，如卷六：

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搜神记》卷六《妖怪》）^③

直接指出天地中的精气依附于万物形成精怪。至于精怪如何变化，则是根据阴阳五行规律。《搜神记·变化篇》点明了万物间的具体变化：

天有五气，万物化成：木清则仁，火清则礼，金清则义，水清则智，土清则思……万物之生死也，与其变化也，非通神之思，虽求诸已，恶识所自来。然朽草之为萤，由乎腐也；麦之为蝴蝶，由乎湿也。尔则万物之变，皆有由也。农夫止麦之化者，沤之以灰；圣人理万物之化者，济之以道：其与

① 王充著：《论衡》，岳麓书社 1991 年版，第 348 页。

②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95 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65 页。

不然乎？^①

万物吸收天地灵气或精气可以变幻成任何形态，无论万物的形体如何千变万化都要顺应自然规律，所以学问狐可以经过千年的修行变化成人，真假难辨，但它们的变化遵循了相生相克的规则，一般的狐狸畏狗，而千年天狐需要燃烧千年的华表木照出真身。千年枯木可制狐的原因，唐代张读在《宣室志》卷八《墓穴狐语》中借用狐妖的口吻解释道：“吾命属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②既然木克土，属土之狐被点燃的木头照出原形自在情理之中。除了用五行相生相克原理解释千年狐狸现出真身外，还有所谓的“惟怪知怪，惟精知精”这一原因。《青琐高议》中有一篇与《斑狐书生》相仿的故事：

晋时，有客舣御沟岸下。夜将半，有人切切语言。客望之，乃一狐坐于华表柱下。狐云：“吾今已百岁矣，所闻所见亦已多矣。”曰：“将谒丞相张公。”华表柱忽发声云：“张华相公博物，汝慎勿去。”狐云：“吾意已决。”柱曰：“汝去，他日无累老兄。”狐乃去。客为丞相公乃是表亲，不知相公。

一日，见有若士人者谒张公。既坐，辩论锋起，往往异语出于义外。公叹服，私念：“此乃秀民，若居于中，岂不闻其名乎？此必怪也。”乃呼吏视之，云：“汝为吾平人津岸东南角华表枯木。”其人已变色，少选将至，公命视之，其人惶愧下阶，化为老狐窜去。

客乃出为公曰：“向宿于桥旁，已闻呱呱不□，□□□□入火焚烧柱，而狐何故化去？”公曰：“惟怪知怪，惟精知精，兹已百余年矣。焚其柱，狐□柱之言，其怪乃化去也。”即知狐之为怪，并今日也。

议曰：妖魅之变化，其详论足以感人。自非博物君子，孰能知之？（卷五《张华相公·用华表柱验狐精》）^③

阅历相当的千年枯木识得千年的狐狸，并且比狐狸更睿智，懂得人世间的人情世故，小心谨慎的生活着。该篇故事与《斑狐书生》相似，故事中的雷焕换做了张华的亲戚，其余的故事人物皆在。狐狸拜访张华，与张华进行辩论，败于下风的张华怀疑书生或者士人是精怪所变，有所防范。但《青琐高议》中的故事比较柔和，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人狐之间还算是和平相处，张华没有《搜神记》中的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7—259页。

② 张读撰；张永钦、侯志明点校本：《宣室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8页。

③ 刘斧撰：《青琐高议》，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5—216页。

冷酷和残忍，狐狸也没有了魏晋士人的风流，故事失去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放之四海而皆准。故事既缺少了新鲜感，也失去了时代性，与干宝的狐故事相差甚远。

董仲舒对老狸比较包容，所以老狸得以逃脱，花斑狐狸却死于非命。张华博学多闻、善于提携后辈，爱惜人才，但对于异物的态度十分明确，无论精怪多么出色，张华也会厌恶它，甚至消灭它，所以得知书生是狐狸后，张华态度大变，想尽办法识破它、杀死它。不单《花斑狐狸》故事如此，《搜神记》其他精怪幻人故事中我们也可窥见一二：有些精怪化做人的样子，只是为了方便害人，如：《吴兴老狸》中老狸化做二男父亲的样子作剧二男，导致儿子们误杀老父亲，老狸化作其父模样，“语其家：‘二儿已得杀妖矣。’”^①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也未识破狐狸的诡计，后被一法师发现擒杀，故事的结尾是儿子获悉真相悔恨而亡，老狸的出现导致农户家破人亡，它的死罪有应得；《白狗魅》中的老狗化作男主人的样子奸淫其妻，被识破真身后杀死，“妇羞愧病死”^②，间接害人性命；《安阳亭》故事中三个精怪危害一方，供人休息的亭子“靡不可宿也，若宿杀人。”^③铲除它们叫人大快人心，“亭毒遂静，永无灾横也”^④；《庐陵亭》中有鬼魅亭中作祟，“宿者辄死。自后使官莫敢入亭止宿。”^⑤汤应以身犯险，夜宿亭楼一探究竟，得知是精怪作恶，追赶精怪并斫伤之，带人寻找，皆得。“自后遂绝，永无妖怪”^⑥危害一方的精怪最终被机智的人类铲除；《细腰》中的精怪破人财运、害人生病，魏郡张奋“忽衰老财散，遂卖宅”^⑦。程应入住后，全家生病举家病疾，于是又转卖给邳人何文，精怪逼迫人类离开这所宅院，最后被何文识破，“烧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宁。”^⑧这些精怪的下场不值得人们同情，甚至让人额手称庆。

有些精怪没有故意害人钱财和性命，只是影响到了人类的正常生活也难逃厄运，如《黑头白躯狗》中经常半夜三更叩门，扰人休息的老狗，遭到人类的厌恶，“杀之乃绝”^⑨；《沽酒家狗》中的老狗冒充亡者生前的样子融入家庭生活，四五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7 页。

②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21 页。

③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22 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22 页。

⑤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09 页。

⑥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0 页。

⑦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31 页。

⑧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31 页。

⑨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19 页。

年未被察觉，因饮酒过多显出真身，被扑杀；《蛇讼》里两位老人为争山头连年打官司，惹怒了官员，“呵格之，化为二蛇。”^①因为惹人讨厌遭到杀害，可见人类对精怪是残酷和苛刻的。

但有些精怪的结局确实惹人怜悯。它们修行多年，幻做人形，没有做错任何事却无缘无故被人类无情杀害，如《钟繇》中钟繇因友人“必是鬼物，可杀之”^②的话起了杀意，妇人明知可能会被杀害，仍相约见面，“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犹斫之”^③，亲密无间的恋人得知对方真实身份后，痛下杀手；《句容狸妇》里狸妇因为少言寡语的古怪行为受到农人怀疑，被斫伤，何其无辜。

《五酉》篇直接论及了人类对待精怪的态度：“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④作为文化先师的孔子，他的话语有一定的权威性，后世奉为圭臬。即使此话非孔子所言，是干宝借先师大儒之口传达，也代表了魏晋士人对待精怪的主流态度，即扑杀一切异类，这也是作者认同的主流文化。

第四节 寄托吴地情结

《胡博士》故事发生于吴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除《胡博士》之外，还有《倪彦思家魅》叙吴时嘉兴倪彦思家被狐妖所祸之事。《吴兴老狸》讲吴兴一户农家被狐妖作恶之事。《庐陵亭》记吴时鬼魅作祟之事，十二篇狐故事有三分之一发生在吴地，寄托了作者的吴地情结。

吴地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吴地从孙吴政权时期开始繁荣起来，后来成为六朝政治中心。居于此地的士人经历了国破家亡和新政权入驻江东的政治剧变，自身的地位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畏畏缩缩的亡国者一举成为左右政权的重要势力，不得不教人感慨世事无常。吴国与魏国斗争的失败迫使孙吴部分旧部为了前途和家族利益不得不北上进入洛阳为官。据翁频《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中统计：“据史书所载，吴亡后，孙吴士人入洛为官的有：周处、吾彦、陶侃、陆机、陆云、顾荣、贺循、甘卓、华谭、陈敏等 25 人。”^⑤人才众所的孙吴，亡国后入洛为官者极少，且陆机、陆云、顾荣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26 页。

②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06 页。

③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06 页。

④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95 页。

⑤ 翁频：《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是在十年后进入洛阳。孙吴旧部们极少进入洛阳为官的原因，除了遵循“忠臣不侍二君”的传统三纲五常观念外，还与朝廷对江南地区不重视有关，正如《晋书·贺循传》中所述：“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①平吴之战后，北人作为战争征服者对亡国之南人持蔑视之态，以亡国之臣身份入朝为官的东吴人士常常受到北人的嘲笑和轻视。史书多有记载，如《晋书·周处传》云：及吴平，王浑登建邺宫酺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②王浑肆意嘲笑吴亡入洛为官的士子；《晋书·吾彦传》中西晋的君臣故意询问东吴官员吴亡的原因；才子华谭也备受轻视，《晋书·华谭传》载：博士王济于众中嘲之曰：“五府初开，群公辟命，采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③《世说新语》也有相关记载：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言语》）^④南人入洛会受到北人的歧视，就连大名鼎鼎的陆氏兄弟也未能幸免。尽管南人机智的言语让北人态度得以改观，但亡国的事实无法改变。除了外界时时事事提醒他们的尴尬境遇外，吴人自身始终无法摆脱“亡国之徒”的身份，陆机在《谢平原内史表》中自称“臣本吴人，出自敌国”^⑤，陶璜上书云“臣亡国之馀，议不足采”（《晋书·陶璜传》）^⑥。这种身份的自我认可，一方面是迫于外界的压力，以求在新环境中自保，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失败者自卑心境的写照，这就是东吴士人在西晋时的政治地位和境遇的真实写照。东吴灭亡后，南人受到压抑，亡国屈辱之感颇为强烈。因此吴地时有暴动，以期复国，如《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载：

武帝太康三年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为乱者相继。^⑦

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825 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570 页。

③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52 页。

④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5 页。

⑤ 王永顺编著：《陆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2 页。

⑥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560 页。

⑦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844 页。

干宝《搜神记·江南童谣》中也有记载：

太康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乱者相继。按“横木”者“四”字，自吴亡至元帝兴，几四十年，皆如童谣之言。“局缩肉”，不知所斥。^①

江东地区局势动荡不安，恋吴、复国大有人在，常常发生“窃发为乱者相继”的情形。到了东晋，从北方的战乱中存活下来的司马氏和北方大族需要借助江东地区作为临时避难所和重新夺回北方统治权的战略基地，北人南渡后，与南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和情感恩怨，吴地士族对北人有强烈的抵触之情。司马睿初到江东，“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晋书·王导传》）^②，受到当地士族冷遇；《世说新语·方正》载：“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缘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纍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③南人严禁与北人通婚，甚至发展为江东大族周勰用武装反对司马氏统治，由此可知，南方士族对北人的统治的十分抵触。

《搜神记》作者干宝也来自吴地。干宝的祖父、父亲均是吴国官员，祖父干统官至奋武将军，封都亭侯；父亲干莹亦是东吴官员，官至丹阳县丞。干宝初仕盐官州别驾（刺史的从吏官），南北对峙时期，举家迁至灵泉乡。干宝虽不是世家大族，但是他的经历和孙吴的其他官员相似，不知道有没有相似的情感寄托？

我们可以从干宝的仕途生涯看其在吴地居住的时间：晋惠帝元康末至太安年间，干宝在江淮地区长大成人，永嘉元年（307年）任盐官州别驾。据李剑国先生考证：海盐、海宁今天均在浙江北部，二县相邻。海盐在海宁东，均临浙江湾。因此两县之间的历史沿革比较复杂。海盐本武原乡，秦置海盐县，汉在县内设盐官，东汉时海盐属吴郡。吴于海盐盐官治立海昌都尉，后改县，此盐官立县之始，二县并立，唯所属州府不同。^④干宝出任江淮地区的官员。王进忠推测：干宝之父应卒于永嘉四年（310年）^⑤。这个时期天下大乱，刘聪于永嘉五年（311年）陷洛

①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4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5页。

③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3页。

④ 李剑国：《干宝考》，《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

⑤ 王尽忠著：《干宝研究全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阳，掳晋怀帝司马炽。干宝徙家灵泉乡为父守孝，直至建兴元年复出。^①关于干宝是哪里人，主要有海盐、海宁之争。李剑国根据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三《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因传》所载内容推测干宝后裔慧因乃吴郡海盐人（今浙江平湖市），干宝也是吴郡海盐人。^②建兴元年（313年）干宝经华谭推荐，“以才器召为著作郎”（《晋书·干宝传》）^③，之后受朝廷派遣，“总督淮扬军旅”，去湘州（今湖南长沙）参加镇压杜弢领导的农民起义。^④因功赐爵关内侯。家贫，求补山阴（今绍兴）令，迁始安（今桂林）太守。太宁元年（323），迁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永和元年（345）致仕，永和七年（351）秋卒，葬灵泉里后花园。从干宝仕途生涯看，干宝大多生活在江淮地区，今浙江，湖南，桂林等江南地区，对江东地区较为熟悉。因此《搜神记》中许多故事涉及江东地区。

干宝的交游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交际对象主要是以吴士为主的南人。这些吴士表现出三方面的群体特征：身份上，先辈曾仕吴；交往中，保持着相互提携的乡土观念；心理上，具有普遍的吴地情结。史书中记载与干宝有交集是王导、郭璞、华谭、翟汤、周访、葛洪、韩友、刘惔等人。

首先是王导，王导与干宝是上下级关系，王导曾上疏皇帝，建议任用干宝为史官。《晋书·干宝传》云：

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纳焉。宝于是始领国史^⑤。

在干宝的政治生涯中，王导不可或缺而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王导推荐干宝领修国史，促使《搜神记》的顺利完成。李剑国先生的《干宝考》一文得出了“建武元年干宝以著作郎领修国史，其撰《搜神记》必始于此年”^⑥的结论。王导重用干宝，一方面是因为干宝的杰出的才华，另一方面还有政治因素，王导要拉拢江东士子为司马氏效力。《晋书·王导传》：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顾荣、贺循、纪瞻、周玘皆南土之

① 王尽忠著：《干宝研究全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② 李剑国：《干宝考》，《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

③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49页。

④ 王尽忠著：《干宝研究全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⑤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37页。

⑥ 李剑国：《干宝考》，《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

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①王导劝说君主要重用江东优秀人士，后推荐干宝为司徒右长史，“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著《晋纪》”（《晋书·干宝传》）^②。王导作为干宝的伯乐，对干宝人生有重要影响。但王导是南迁士族，对吴地士子提携并没有乡土情感，而以政治因素为主。

郭璞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建平太守郭瑗之子。郭瑗出身寒门庶族，在西晋时初任尚书都令史，《晋书》载“父瑗，尚书都令史。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瑗多驳正之，以公方著称。终于建平太守。”（《郭璞传》）^③干宝与郭璞是上下级关系。史书载干宝为著作郎，郭璞为佐著作郎，据《晋书·卷二十四·志十四·职官》：“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④两人相识应在此时。

二人因为相同的兴趣成为朋友。郭璞是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著有《周易新林》、《易洞林》、《易斗图》、《周易玄义经》、《尔雅注》、《尔雅音》、《尔雅图》、《方言注》、《三苍注》、《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水经注》、《三命通照神白经》（属五行类）、《楚辞注》等作品。而干宝的著作有《周易注》、《周易宗涂》、《周易问难》、《周易爻义》、《春秋序论》、《春秋左氏义外传》、《后养义》、《杂议》、《司徒仪》、《周官礼注》、《周官驳难》、《周官音注》、《七庙议》、《毛诗音隐》、《百志诗》、《百志诗集》、《正言》、《干子》、《晋纪》、《搜神记》等。两人著作颇丰，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郭璞兼及易学、方言注音、地理方志与五行研究；干宝则易学、史书、礼书都有研究，并亲自撰写史书，还以史书笔法撰写《搜神记》。干宝热衷研究五行、阴阳观念，这点与郭璞“好经术，……妙与阴阳算历。洞五行、天文、卜筮，禳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晋书·郭璞传》）^⑤在鬼神、方术、讖纬上的追求是一致的。郭璞“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著作郎干宝常诫之曰：‘此非适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晋书·郭璞传》）^⑥干宝经常劝诫郭璞注意日常修养，不可过度任性，郭璞不听从干宝的劝

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746 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137—2138 页。

③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899 页。

④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35 页。

⑤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899 页。

⑥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04—1905 页。

告，后为王敦所杀，可见两人关系很好，可推心置腹。

对于宝仕途有帮助的还有华谭。华谭久居吴地，而且出身官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仕吴，而华谭有没有仕吴，史无记载。《晋书·华谭传》载：

华谭，字令思，广陵人也。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诩，吴黄门郎。谭期岁而孤，母年十八，便守节鞠养，勤劳备至。及长，好学不倦，爽慧有口辩，为邻里所重。扬州刺史周浚引为从事史，爱其才器，待以宾友之礼。^①

华谭有真学实才，为周浚所重。晋灭吴后，华谭入洛，晋武帝亲自询问华谭关于孙吴地域问题的看法，为稳定江东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他以识人著称，举荐了许多人才，如《晋书·华谭传》载其早年为鄆城令，“廷掾张延为作答教，其文甚美。谭异而荐之，遂见升擢。……又举寒族周访为孝廉，访果立功名，时以谭为知人”^②；“时晋陵朱凤、吴郡吴震并学行清修，老而未调，谭皆荐为著作佐郎”^③；“谭荐干宝、范珧于朝”^④，可见其有知人善用的能力，对吴地贫寒士子多有提携之恩。华谭在江东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晋书》卷五二《华谭传》载：“甘卓尝为东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诛之，卓投谭而免。”^⑤由此可见华谭素与江东人物交往密切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东海王手下救得甘卓一命，为稳定江东地区和寻找江南士子的出路，华谭竭尽全力，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吴地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干宝的朋友——翟汤(272-344)，柴桑县(今九江县)人，是一位隐士。西晋末年，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不少读书人和士大夫为逃避乱世而厌弃仕途，借隐居终其一生，翟汤就是其中的一员，他选择隐居庐山。干宝与翟汤交好，在生活上接济翟汤，《晋书》卷九四《隐逸·翟汤传》有如下记载：

始安太守干宝与汤通家，遣船饷之，敕吏云：“翟公廉让，卿致书论，便委船还。”汤无人反致，乃货易绢物，因寄还宝。宝本以为惠，而更烦之，益愧叹焉。^⑥

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453 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452 页。

③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454 页。

④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453 页。

⑤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453 页。

⑥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445 页。

两人私交甚好，翟汤以“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人有馈赠，虽釜庾一无所受。”（《晋书·翟汤传》）^①的高尚品行著称。翟汤作为隐士的高洁情操受到士人钦佩，干宝也不例外，翟汤隐居不仕，生活清贫，干宝在经济上资助他，这一行为反倒增加了这位好友的烦恼。好友之间的互相理解、尊重、支持的关系令人羡慕。

周访与干宝有同郡之谊，且同朝为官，两人之间有交集在情理之中。“周访字士达，本汝南安城人也。汉末避地江南，至访四世。吴平，因家庐江寻阳焉。祖纂，吴威远将军。父敏，左中郎将”（《晋书·周访传》）^②。周访是吴地将门之后，汉末大乱时已居住在江南地区了。“为县功曹，时陶侃为散吏，访荐为主簿，相与结友，以女妻侃子瞻。”（《晋书·周访传》）^③与出身寒门的同郡人陶侃交好，嫁女与其子。《晋书·陶侃传》载其“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④。陶侃的父亲也曾仕吴，与周访的情况相似。周访与陶侃交好反映出了吴地士人之间相互提携，互相欣赏的风气。周访与陶侃共同平定杜弢之乱：

帝以访为振武将军，命访与诸军共征杜弢。（《晋书·周访传》）^⑤

访复以舟师造湘城，军达富口，而弢遣杜弘出海昏。时湓口骚动，访步上柴桑，偷渡，与贼战，斩首数百。贼退保庐陵，访追击破之，……帝又进访龙骧将军。（《晋书·周访传》）^⑥

侃复率周访等进军入湘，使都尉杨华为先驱，击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晋书·陶侃传》）^⑦

杜弢之乱影响甚广，波动了整个吴地，除武将周访、陶侃互相帮助共同对敌外，著作郎干宝也受朝廷派遣，去湘州（今湖南长沙）镇压杜弢之乱，最终因“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晋书·干宝传》）^⑧，周访与干宝的交集应该是在平定杜弢之乱的这段时间，至于两人交情的深浅，史书中未有过多记载。

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445 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578 页。

③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579 页。

④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768 页。

⑤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579 页。

⑥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580 页。

⑦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771 页。

⑧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149 页。

干宝推荐友人葛洪为官，是因为两人同为吴人，有史才，又对鬼神之道感兴趣，二人共同点很多，交情很深。葛洪出身江南士族，其父祖辈在东吴历任要职。十三时其父去世，乃“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晋书·葛洪传》）^①。大名传到干宝耳中，“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晋书·葛洪传》）^②。虽未如愿，也未影响二人之间的友谊。

干宝和葛洪都爱言鬼神，支持儒道兼修，反对社会上谈玄论道之风。葛洪著《抱朴子》一书，《内篇》言鬼神仙、丹药之事；《外篇》吐得失、臧否之言，可谓儒道兼修。葛洪与干宝一样反对魏晋“放浪形骸”的社会风尚，如《抱朴子·疾谬》载：

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擣草捕弹棋，所论极於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繡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駸野。^③

葛洪看到儒学已经崩溃，世人不再遵循礼教，傲慢成性，玩乐人生，于酒肉声色中度过自己的一生。这种“放浪形骸”的人生行为与清谈讲道是背道而驰的，他是反对这种社会风尚的，这与干宝反对过分炙热的清谈之风如出一辙。同时葛洪支持“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

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并成，则弃置人间，专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抱朴子内篇》卷八《释滞》）^④

葛洪虽然向往道家极其自由的生活，但也支持儒家治国安天下的理念，是一位儒道兼修的学者。对既专注于史书研究又兼顾阴阳之术研究的干宝来说，二人有相似的兴趣、思想，又都是江南才子，互为朋友合情合理。

干宝相信鬼神变化之术，而史书中记载的韩友是一位方术，“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能图宅相冢，亦行京费厌

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11 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11 页。

③ 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601 页。

④ 王明著：《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35 页。

胜之术”（《晋书·韩友传》）^①。韩友擅长风水、厌胜之术，《晋书·韩友传》载：

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转祸，无不皆验。于宝问其故，友曰：“筮封用五行相生杀，如案方投药治病，以冷热相救。其差与不差，不可必也。”^②这里的于宝应该是干宝，干宝与之讨论占卜之术，韩友认为占卜符合阴阳五行规律，能够消灾止祸，与干宝的阴阳五行观念相符，两人有共同的话题、兴趣，这是人们称为朋友的前提。

干宝的著作《搜神记》被刘惔评价为“鬼之董狐”（《晋书·干宝传》）^③，这是史书中干宝与刘惔的交集。而这位刘惔出身世宦家庭，沛国相县（今安徽省宿州朱仙庄镇）人，少时便为王导所赏识，时人比之为荀彧，历任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等职，故后世称其为“刘尹”，是东晋著名清谈家。《晋书·刘惔传》云：

恒温尝问惔：“会稽王谈更进邪？”惔曰：“极进，然故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复谁？”惔曰：“故在我辈。”^④

魏晋名士的自信风度在刘惔身上完美展现。《世说新语》一书自然少不了名士刘惔的身影：

何骠骑亡后，徵褚公入。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言语》）^⑤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方正》）^⑥

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县所省殷扬州，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识鉴》）^⑦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

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476 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477 页。

③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150 页。

④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991 页。

⑤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63 页。

⑥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86—187 页。

⑦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21 页。

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赏誉》）^①

关于刘惔的几篇故事把能言善辩、自恃清高、善于识人、赞赏人的魏晋士人的风貌全部展现了出来。从刘惔的各个方面来看，干宝与他没有一点共同点，那么干宝把作品给刘惔是为借此提高身价，还是同为王导一派，有同僚之谊？笔者认为，干宝让清谈名士刘惔评价自己的作品，是因为刘惔有真才实学，善于识人。《搜神记》评为“鬼之董狐”（《晋书·干宝传》）^②，其实是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当时小说处于补史的地位，刘惔有识人的能力，看到了干宝《搜神记》一书的特点，即以史书笔法写作小说和故事的纪实性。两人没有共同的特点，交情应该不是很深。

干宝一生大多时间生活在南方，对吴地相当熟悉，史书中与干宝有交集的人士大多是南人，且父祖辈仕吴，这一代士人距离吴国灭亡的时间较近，能亲身体会亡国之悲。在干宝的交往中，吴地文士之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因同郡之谊互相提携。华谭与南方士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维系着江东地区的稳定，举荐吴地士子进入朝廷任职。周访和陶侃结为姻亲，在仕途上互相帮助，干宝举荐自己的好朋葛洪为官，这表明吴士之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到了东晋，朝廷政治中心转移到江东，南方士人之间为了地域和家族利益积极提携同郡文士，地域观念加强，积极参与政治，与北方大族共同统治江东。《搜神记》中涉及吴地的故事很多，尤其是吴先主孙权之事，以“吴先主”这一称谓肯定了吴国君主的历史地位。其次是孙皓故事中负面形象较为突出，也是在反思吴国灭亡的原因，干宝对吴地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地缘情结。

① 徐震堉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7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0页。

结 语

狐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物质需求到文化层面，狐都满足了人类的各种需求。《搜神记》是中国志怪小说中不可忽视的代表之作，继承两汉狐故事除怪文化的同时，试图扭转人狐对立的关系，从狐故事的最终或死或逃的结局看，作者的这一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故事类型——学问狐故事。在这几篇狐故事中，学问狐的妖性被淡化，凸显的是其博学多识、风流潇洒、传道授业的人性特点，努力融入人类社会，并试图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干宝作为史官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以史书的笔法撰写《搜神记》，赋予狐故事以真实的背景，如其中的真实历史事件及区域。同时身份的归属感使得干宝笔下的学问狐都是正面的形象，它们是社会支柱和精英，是魏晋主流文化的代表。它们敢于挑战权威人士，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不满，爱好学问，热衷交谈，无害人类。但结局往往充满了悲剧色彩，人类对它们怀有杀之而后快的敌对心理，这是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除怪文化心理的折射，反映了人类盲目相信万物有灵的观念。

《搜神记》狐故事因其较强的时代性而魅力恒久。好学盛况、清谈风气反映到小说中就是出现了一批容貌出众，自信满满，能言善辩，崇尚老庄的清谈高手，其中既有人类，又有精怪，可见浓郁的文化氛围。狐故事还隐藏着作者对吴地的眷恋之情，以及重振儒学、清除清谈之气的负面影响的初衷，这些内容得以在狐故事中得到展现，这也是《搜神记》狐故事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一、古籍文献

- [1] 班固撰、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 陈寿撰、裴松之注.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3] 程树德撰; 程俊英、蒋见元点校. 论语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4]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 酉阳杂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5]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
- [6] 范晔撰、李贤等注.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7]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8] 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9] 干宝著、胡怀深标点. 搜神记[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7.
- [10] 郭璞著、张宗祥校录. 足本山海经图赞[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 [11]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 搜神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2] 郭璞注. 穆天子传[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2.
- [13] 干宝撰、李剑国辑校. 新辑搜神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4] 桓谭. 新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 [15] 洪亮吉撰. 左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6] 焦延寿. 焦氏易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7] 姬昌著、宋祚胤注译. 周易[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 [18] 刘斧. 青琐高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9] 李昉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20]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1] 刘义庆撰、郑晚晴辑注. 幽明录[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 [22]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 艺文类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 [23] 彭定求等校点.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24] 隋树森. 全元散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2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6] 陶潜撰、李剑国辑校. 新辑搜神后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27] 王明著. 抱朴子内篇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8] 王充著、陈蒲清点校. 论衡[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1.
- [29] 王永顺. 陆机文集[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 [30] 徐震堉. 世说新语校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1] 萧统编、李善注.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32]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33] 杨伯峻编著.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34] 杨明照撰. 抱朴子外篇校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35] 袁珂校注. 山海经校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 [36] 张读撰; 张永钦、侯志明点校. 宣室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7] 赵晔撰、吴琯校. 吴越春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8] 殷芸撰、王根林校点. 小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二、研究著作

- [1] 包兆会. 西汉初中文艺思想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2] 陈寅恪.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3] 韩国河. 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 [4] 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79.
- [5] 吉野裕子. 神秘的狐狸——阴阳五行与狐狸崇拜[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
- [6] 鲁迅. 鲁迅全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 [7] 李威熊. 董仲舒与西汉学术[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78.
- [8] 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研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9] 罗宗强.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10] 罗宗强.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 [11] 王尽忠. 干宝研究全书[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9.
- [12]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 [13] 周桂钿. 董学探微[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14] 张旭华. 九品中正制略论稿[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 [15] 郑裕华. 《搜神记》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16] 郑妹珠. 干宝生平与学术研究[M]. 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5.

三、期刊论文

- [1] 李剑国. 干宝考[J]. 文学遗产, 2001(2).
- [2] 刘继红. 中国古代学校制度沿革探微[J]. 珠海教育学院学报, 2002(4).
- [3] 李伯重. 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J]. 历史研究, 2005(6).
- [4] 田余庆. 论东晋门阀政治[J]. 北京大学学报, 1987(2).
- [5] 翁频. 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2010(1).
- [6] 张庆民. 干宝生平事迹新考[J]. 文学遗产, 2009(5).
- [7] 张玉莲. 《搜神记·斑狐书生》的文学与文化解读[J]. 殷都学刊, 2011(4).
- [8] 张兴成. 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探析[J]. 历史研究, 2011(1).

致 谢

三年研究生生活转瞬即逝，此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有学习生涯即将结束的遗憾，有步入社会的兴奋和忐忑，更多的则是对母校的留恋和不舍。

从硕士论文开题到论文完成提交的整个过程，我的导师张蕾老师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论文开题之处对我的论文进行了启发，让我能够较为清晰明白论文的立意及开题意义，并在之后结合我的开题立意，给予理论上的指导帮助，扩宽我的写作思路并深化论文的论点。在论文初稿完成后，张老师仔细阅读我的论文，并提供了很多修改的意见，在我修改过程中，进一步的给予学术上的指导与精神上的鼓励，让我有顺利完成学业的信心。张老师对我的鼓励让我能够在之后论文修改期间树立了自信与克服困难的决心。为此，我再次感谢张老师三年来对我的耐心指导与悉心培养，我能做的就是不辜负老师对我的培养与期待，认真、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我还要感谢学校提供的良好学习环境以及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学习资源，感谢在平时生活、学习中给予我巨大帮助的各位老师、学姐以及同学们，感谢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是你们让我学会了遇到困难要越挫越勇，成绩面前要勿骄勿躁，继续努力以期获得全新的自我提升，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争取获得好的成绩来回报学校的栽育之恩。